

宋代士大夫參與地方醫書刊印新探

陳韻如*

過往學界對宋代醫書刊印的研究集中在朝廷上，對於非朝廷的地方醫書刊刻，包括地方政府、私人、和書坊的醫書出版，多舉例性地羅列出版者和出版資訊。本文全面搜羅地方醫書雕板的史料，分析士大夫（指有功名和曾任宦者）對醫書刊印的參與，並將學界較少探討的「刊印協助者」此一角色納入觀察。

自十一世紀開始，許多士大夫以出版者和刊印協助者的身分投入地方醫書的雕板。不同於朝廷所刻的醫書以宋代朝廷編纂者和宋以前的醫書為主，士大夫出版者較少重刻校正醫書局曾校勘的監本醫書，反而對宋代私人編纂醫書之刊印更具興趣。影響士大夫刻書選擇的重要因素為地緣和人際關係。地緣關係包括：雕板紀念前任知州所編纂的醫書、刊刻該州知名士大夫的醫書。人際關係如付梓同僚家屬、親戚、或醫學老師所撰的醫書。除了出版醫籍，士大夫另會透過交遊網絡推動醫書付梓，並應作者或出版者所求，提供書籍、金錢、讚美文章等物資協助醫書付梓。作者或出版者所求助的士大夫涵括：長期接受作者或出版者醫療資源的官員、不熟識的鄉里名人、筵席上和拜謁認識者。求文者所看重的常是對方身為士大夫的聲名，而非其醫術。士大夫在醫書刊印活動中的活躍，有助解釋醫術普遍不高的宋代士大夫們，對醫書的評價為何仍受到醫者和醫書作者的重視。本文希望從出版文化的角度，拓展學界對尚醫士人的認識，並刺激學界反思校正醫書局對宋代醫療發展的影響。

關鍵詞：出版文化 士人文化 醫學 印刷術 知識網絡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前言

中國出版史和中國醫療史都注意到宋代醫書刊印大興的現象。目前對此現象的研究，集中在朝廷的醫書雕板上，對於朝廷在何時何地刊刻何書、刊刻目的、出版前的編撰與校勘、以及參與者的身分、作用與分工都有深入的探討，並且指出儒臣在北宋朝廷的醫書刊印政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¹ 對於朝廷之外的地方醫書雕板，包括地方政府、私人、書坊所刊印的醫書，學界多舉例性地羅列出版者、所刻書、出版的時間和地點，較少探究刊刻活動的內容，例如：出版者為何刊印該書、有何參與者、參與者間如何互動等。² 本文則全面搜羅地方醫書雕板的史料，以士大夫的參與為切入點，探討地方醫書付梓的活動內容。除了關注刊刻活動外，本文與前賢觸及地方醫書出版的論著在研究取徑的另一個差異為：前賢論著集中探討作者和出版者二類角色，偶爾兼及刻工，本文則將「刊印協助者」的角色納入討論。此角色對書籍生產的幫助不在書籍內容本身（例如：校者、參閱者），而在於提供有助醫書付梓的物資或人際網絡。本文將顯示：加入此角色後，更可突顯士大夫對

¹ 中國出版史對北宋監本書籍雕印的研究成果豐碩，經典研究如：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一九四〇年商務印務館《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本影印）；宿白，〈北宋汴梁雕板印刷考略〉，氏著，《唐宋時期的雕板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 12-71，原刊於《考古學研究（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醫療史研究則有：Asaf Goldschmid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ng Dynasty, 960-1200*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陳名婷，〈宋代官修醫書考〉（臺中：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碩士論文，2011）；韓毅，《政府治理與醫學發展：宋代醫事詔令研究》（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頁 32-81；范家偉，《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以國家與醫學為中心》（香港：中華書局，2014）。

² 例如：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 145-152；吉文輝、王大妹主編，《中醫古籍版本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頁 136-141；李致忠，《中國出版通史·4·宋遼西夏金元卷》（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頁 128-130；楊玲，《宋代出版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 64-101。韓毅的新著《宋代醫學方書的形成與傳播應用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也是代表性的例子。該書在前言和結論外的六章主章中，四章詳細討論了朝廷所編的《太平聖惠方》、《神醫普救方》、《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聖濟總錄》等書的雕板與流通，另一章舉例性地列出非朝廷的地方醫書刊刻，很少分析地方醫書的刊印活動內容。梁其姿在探討刻本醫書對宋金元醫學發展的影響時，便指出目前學界對宋金元時期醫書印刷的文化史（例如：誰決定刻什麼書等）還留有許多討論空間。Angela Ki Che Leung, "Medical Learni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i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 Paul J.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 395-396.

地方醫書刊印的重要性。³ 本文的討論並將指出地方醫書的刊刻與目前學界所見的朝廷刻醫書多有差異，若欲更準確地掌握宋代醫書出版與流通網絡的形成與變化，理解地方醫書的刊刻將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本文以地方相對於朝廷，而非以官刻、私刻來區分，是因近期的宋代出版史研究已指出地方官員會利用任職機構雕板書籍，此刻書活動並非源自朝廷的命令，更接近該官員的個人選擇，甚至有時資金還是來自該官員。如此稱其為官刻似有誇大其官方性質之嫌。學界雖然指出官刻和私刻無法清楚區分的難題，但對於可以用何種新的分析框架取代普遍使用的官私分類，尚未形成共識。⁴ 考量到宋代醫書刊刻的研究目前以朝廷刻書為主，本文採取朝廷與地方的分別，以利與既有的研究成果對話，從而突顯朝廷與地方在醫書刊印上的異同，並刺激學界反思校正醫書局對宋代醫療發展的影響。

本文用「士大夫」一詞，專指有文官的仕宦經歷或有功名者。學界目前未對此類人有統一的稱呼，或稱「士大夫」、或稱「士人」；英文翻譯也各色各樣，最常見者為 *scholar-officials*、*literati*、*cultural elites*。本文選擇以士大夫，而非以士人或儒稱呼此類人，是為了避免與前賢所討論的「士人」一詞混淆。重要的中國古代醫療史研究已用「士人」一詞指具有儒學素養，但不一定有科第功名者。⁵ 為了彰顯宋代醫書出版參與者的內部層級差異，本文選擇以「士大夫」一詞指曾擔任文官和有功名者；並沿襲前賢用法，以「士人」稱呼有儒學素養、但不一定有功名和仕宦者。此定義是考量到宋代私人付梓醫書的史料中的作者、出版者和刊印協助者，無

³ 書籍閱讀史研究已指出書籍的出版與流通需多種角色的參與，包括：作者、出版商、原料供應者、經費提供者、運輸者、書販等。經典討論見：Robert Darnton, "History of Reading," in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ed. Peter Burke (Cambridge: Polity, 2001), pp. 157-186. 本文將士大夫分為出版者和刊印協助者只是為了突顯士大夫在醫書出版可以提供的多種支持，不代表這些支持是互斥的。

⁴ 對官私出版分類的反思，見田建平，《宋代出版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頁 296-297；何朝暉，《晚明士人與商業出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 19-26。朱迎平指出宋代各級地方政府刊印別集，大多「實際上成為士大夫利用自己掌握的地方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進行的刻書活動」，見氏著，《宋代刻書產業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151。中醫文獻學專著在介紹醫書時，常將其分為官編和私纂兩類，再討論醫書內容。如此分類是以醫書作者和編者為出發點，難以直接套用於醫書出版者身分的討論上。例如：馬繼興，《中醫文獻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張燦琿，《中醫古籍文獻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

⁵ 最經典的例子為陳元朋，《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兼論其在金元的流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7）。該書對士人的定義見頁 14, 23。

論是否有功名、營生方法為何，絕大多數都有經、史或文學等儒學素養。換言之，都符合前賢研究中的「士人」定義。⁶如本文將顯示的，跟無功名者相比，有功名者和有仕宦經歷者在醫書刊印活動中，常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們的支持也更受欲付梓醫書者的重視。有鑒於此，本文特別區別「士大夫」和「士人」的用法。在此用法中，官員、士大夫、士人群體是三個同心圓。士人是最大的圓，包含士大夫與官員；士大夫是次大的圓，包含官員；官員則是最小的圈子。最外圈的士人可因登第或仕宦，往更內層的圈移動。在分析史料時，某人屬於士人、士大夫、還是官員的判定，本文最先依據該篇史料撰者的稱呼。當史料撰者沒有明言時，則根據史料所述事件發生時，該人的經歷而定。例如：若當時正在任官，則稱官員；若有功名或曾任官，則稱士大夫；若曾準備舉業，但無功名，則稱士人。

宋代士大夫除了刊印醫書外，還會雕板傳播單篇藥方。諸如：洪邁記歙縣縣丞胡權，遇異人授以治癰疽內托散方，治療頗有效驗；之後「予兩兄（即洪适、洪遵）以刻於新安當塗郡」。⁷只是此類史料零碎，難以深入討論，本文的分析仍以醫書的刊印為主。⁸以下將士大夫對醫書刊印的參與依據介入程度分為三大類討論，首先分析介入程度最高者、即士大夫即為醫書出版者；次述士大夫雖非出版者，但主動利用交遊網絡推行某部醫書的雕板；最後考察應邀而參與刊印活動的士大夫們。

⁶ 宋代並未對有儒學素養但無功名者、以及中舉者這兩類人，形成統一且穩定的分類稱呼。對通過解試的考生和曾參加省試的考生在稱呼、科第資格、任官資格和法律優待等方面，也都尚未發展為定制。官員亦無「(官)紳」等固定名稱。這些情況都迥異於明清。李弘祺，〈宋代的舉人〉，國際宋史研討會秘書處編，《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史學系，1988），頁 297-314；高橋芳郎，《宋—清身分法の研究》（札幌：北海道大學圖書刊行會，2001），頁 183-222。

⁷ 洪邁，《夷堅丙志》（收入氏著，何卓點校，《夷堅志》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一六，頁 505。洪遵對此事的記載與洪邁略有出入。洪遵記洪适刊該方於徽州，見洪遵，《洪氏集驗方》（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卷二，頁 11。洪适於紹興二十九至三十一年（1159-1161）間知徽州，見凌郁之，《洪邁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159, 167。

⁸ 又，現存關於士大夫參與地方醫書刊刻的史料，南宋遠多於北宋。囿於史料，本文對南宋的討論將多於北宋。唯文章標題仍以「宋代」而非「南宋」稱之，是希望突顯兩宋士大夫刊刻地方醫書在濟眾理念和所刻醫書選擇的相似處。

二·士大夫刊刻地方醫書及其與朝廷刻書之異同

既有研究已經列舉出許多士大夫曾刊印醫書。奠基在表二「宋代刊刻醫書概況表」包含的史料出處上，本節進一步探討士大夫出版者在宋代醫書出版的大致比重，並比較士大夫與朝廷在醫書刊刻上的異同，以掌握士大夫刊刻地方醫書的性質。表二列出筆者目前所知的宋代醫書刊刻版本 (printed editions)。⁹ 製表之目的不在於窮盡宋代所有的醫書刊刻版本份數，而是理解宋代至少有幾份醫書刊刻版本。因為縱使搜盡傳世典籍、考古材料、圖書目錄、拍賣圖錄等資料，仍無法得到確切的數字。這與史料散佚、資料不全、記載錯誤、有些刊本的朝代判定不易等因素皆有關聯。所謂的新、舊版也無法完全區隔，因為有時新版是直接舊版上重刻修改。該表對出版者的判定是依照資料所言的醫書出版主詞來判斷，但宋人對出版者為官員或官員所任職的機構，不一定有嚴謹的區分。例如：樓鑰跋《中藏經》時曾云：「一日得閩中倉司所刊《中藏經》讀之，其說具在。蓋貳卿姜公詵為使者時所刊。」（表二，總號 77）¹⁰ 不確定究竟是姜詵、還是福建路提舉常平茶鹽司主導了《中藏經》的刊刻。鑒於以上的資料限制，表二所舉的數字無法視作現代統計學意義下的精確數字，只能視作示意的數目。不只是醫書，許多宋代出版史論著在探討其他文類的刊刻版本時，也一直面臨以上的種種不確定因素。如同本文，這些論著在意識到上述的各種不確定因素後，仍採行此研究方法，以期將個別書籍的出版放在較具整體性的刊印概況中理解。¹¹

⁹ 本文用「刊刻版本」而非刊刻次數來計算的主要原因是：宋人有時一次會刊刻多部醫書，用刊刻次數來計算並不準確。學界對宋代刊刻筆記的考察，也是以刊刻版本、而非刊刻次數來計算，見 Hilde De Weerd,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Written Notes' (*biji*)," in *Imprimer autrement: Le livre non commercial dans la Chine impériale*, ed. Michela Bussotti and Jean-Pierre Drège (Geneva: Librairie Droz, 2015), pp. 19-47.

¹⁰ 為了避免正文註腳過於冗長，當正文所討論的某部醫書刊行的史料，與該書在表二「宋代刊刻醫書概況表」的史料是相同出處時，正文不另出註，代之以該書在表二的總號。

¹¹ 相同的研究方法與計算困難可見於宋刊筆記研究。例如：魏希德 (Hilde De Weerd) 參考潘銘燊的博士論文和《現存宋人著述總錄》等書，整理出宋刊筆記的刊刻版本概況表，並以該表討論兩宋筆記刊印者 (printers) 的身分變遷。其他文類的類似研究方法如：張高評以宋刊宋詩別集的版本數目和刊刻地點，觀察宋詩別集的出版如何呼應宋詩風格的發展。Hilde De Weerd,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pp. 289-307；張高評，〈宋人

據表二「宋代刊刻醫書概況表」的「出版者及其身分」一欄，士大夫無法確定為宋代最主要的付梓醫書群體，只能說他們在醫書出版中佔有一席之地。這主要是因兩百一十四份醫書刊刻版本中有六十四份出版者名稱不詳。在其餘一百五十份可知刊刻者名字或能推測刊刻者身分的醫書刊刻版本中，士大夫出版者有五十份，¹² 朝廷三十九份（其中北宋佔三十六份）、¹³ 醫者十一份。¹⁴ 至於商業書坊刊刻多少份醫書，則很難斷定。在商業書坊史料零散的宋元時期，我們難以確知冠以宅、堂、書院等詞的出版機構屬於坊刻還是私刻。¹⁵ 只有極少數的例子，學界都同意該書是商業書坊所刊行，例如：現存成都眉山地區萬卷堂所刻的《十便良方》。其被認為是坊刻的原因之一，是該版本的殘本在目錄後有牌記「萬卷堂作十三行大字刊行，庶便檢用，請詳鑒」。¹⁶ 書名的「新編近時」四字和牌記內容可能都是商業書坊推銷該書的廣告詞。¹⁷ 如果將名為宅、堂、書院的出版機構都視作坊刻的話，商

詩集之刊行與詩分唐宋——兼論印刷傳媒對宋詩體派之推助》，《東華漢學》7 (2008)：67-128。

¹² 表二總號 24, 29-30, 37, 40, 50, 52-53, 59-63, 68, 71, 77, 79-80, 82, 84, 91-99, 102-103, 108, 110-112, 116-123, 127, 129, 132-133, 138, 149, 175。總號 65 號的出版者實材為武官官階，本文未列入士大夫出版者中計算。

¹³ 表二總號 1-4, 6-17, 19-22, 26-28, 31-36, 39, 41, 43, 48-49, 51, 55, 70, 72-73。Hinrichs 指出唐代朝廷雖然也有編修和頒行醫書，但是以石刻為主要的傳播途徑；直到宋代，朝廷才大量利用文本傳播醫療知識。根據潘銘燊的統計，醫書佔宋代朝廷刊刻書籍的第三大項：第一大項是儒家經典 (Confucian classics) 及其注釋，計 85 份刊刻版本 (imprints)；第二是朝代史 (dynastic histories)，計有 40 份；第三是醫書，計 38 份。T. J. Hinrichs, "Governance through Medical Texts and the Role of Print," in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China, 900-1400*, ed. Lucille Chia and Hilde De Weerd (Leiden: Brill, 2011), pp. 217-238; Poon Ming-sun, "Books and Printing in Sung China (960-1279)"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9), p. 123.

¹⁴ 表二總號 23, 115, 142-143, 145, 151-152, 163, 170, 199-200。

¹⁵ 賈晉珠 (Lucille Chia) 在考察福建建陽一地的商業刻書活動時，就指出很難判斷書院、精舍、家塾是否為商業書坊；但自言透過考察這些刻本，通常可以解決大部分的判斷問題。可惜她未對各本書的判定方法提出更具體的說明。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or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2002), pp. 307, 312.

¹⁶ 陳堅、馬文大，《宋元版刻圖釋》（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頁 206。

¹⁷ 《十便良方》今存二類傳本，一是萬卷堂宋刊殘本，一是日本的影宋抄本。影宋抄本名為《備全古今十便良方》。抄本書名的「備全古今」與「新編近時」相對比，較不強調內容的時新性。《十便良方》二類傳本的傳播史，見鄭金生、蕭永芝，〈影印說明〉，郭坦，

業出版的份數為十五份。¹⁸ 六十四份出版者不詳的宋刊醫書中，其中不乏來自近現代藏書家和版本學家鑒定只知為宋刊本者。這些不詳者中，或有些是由書坊刊刻。相對於士大夫，這些宅、堂、書院等出版機構，例如余唐卿宅、余恭禮宅等，很少留下可資分析出版活動或其身分的文字。¹⁹ 不過即使是由書坊刊刻，出版活動的發起人也不必然是書坊主人，也有可能是作者委託書坊雕板書籍。醫書的案例就有兩例：朱肱 (1068-1165) 重校《南陽活人書》（原名《傷寒百問》）後，「命工於杭州大隱坊鏤板，作中字印行」，連字體的大小似都是朱肱決定。²⁰ 周守忠委託臨安府尹家書籍鋪刊刻的《歷代名醫蒙求》（表二，總號 134）。

這五十份由士大夫刊行的醫書包括：雕板時間橫跨兩宋者四位、刻醫書版本五份；北宋雕板者七位、刻醫書版本八份；南宋二十八位、刻醫書版本三十七份。南宋的人數遠多於北宋。對於兩宋整體雕板書籍的數目差異，學界通行的解釋為：南宋印刷術較北宋發達，一方面可能使南宋較多人選擇以雕板的方式傳播書籍，另一方面也讓更多有關書籍刊刻的史料留下。因北宋相關史料多所散佚，南宋士大夫刻書究竟在多大程度可說是南宋的新現象，很難論斷。僅就醫書而言，雖然北宋士大夫便有廣傳醫書以濟眾的論述，但傳播手段常是刻石、書以方板等。而且一些論著頗豐並曾編撰醫書的北宋高層文官，皆未曾提過想用雕板來傳播醫書，例如：曾著《藥準》的文彥博和曾著《良方》與《靈苑方》的沈括。與北宋相比，南宋似乎有更多士大夫偏好以雕板的形式來傳播醫書。

在三十九位士大夫出版者中，七位在任官地的地方政府機構刊刻，包括五位在任官地的郡齋刊刻（表二，總號 79, 91, 94-95 [與 94 同出版者] , 102, 119），一位

《（備全古今）十便良方》（收入曹洪欣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第 18 冊），頁 1-3。

¹⁸ 表二總號 18, 88-89, 125, 141, 150, 160-161, 164-167, 185, 188, 192。戚福康舉十份醫書和一份類書的刊刻版本為例，認為南宋書坊中「一個很突出的現象」是大量刊刻醫書。真柳誠主張作為商品的醫藥刊本自南宋十二世紀已普遍化。戚福康，《中國古代書坊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 124；真柳誠著，郭秀梅翻譯，〈中日韓越醫學著作數量、內容及其社會經濟背景〉，《古今論衡》30 (2017)：52。

¹⁹ 明清相對留下較多史料。包筠雅 (Cynthia J. Brokaw) 曾指出明清福建四堡地區的周氏和馬氏書商試圖建構「儒商」、「儒賈」、「士商」的形象。Cynthia J.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pp. 268-301.

²⁰ 朱肱，《南陽活人書》（收入《朱肱、龐安時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6），〈後序〉，頁 7。

在所任該路的提舉常平茶鹽司付梓（表二，總號 77）、一位在轉運司雕板（表二，總號 129）。²¹ 七位中有五位留下說明出版緣由的文章，五篇文章都將自己呈現為醫書出版的主導者，例如：洪遵記「右集驗方五卷，皆予平生用之，有著驗。或雖未及用，而傳聞之審者。刻之姑孰，與眾共之」（表二，總號 79）。²² 從這五例看來，表二列出地方政府所刻的其他十二份醫書版本中，有些應是由當地官員主導出版。²³ 若是如此，士大夫出版者的人數和刊刻的醫書版本將會比表二所列的三十九位和五十份更多。

本節以下就刊刻理由、校勘者的參與、刻書種類、選擇所刻書的理由四個方面，比較這些士大夫出版者和朝廷在刊印醫書的異同。其中前兩方面相似處較多，後兩方面則有較明顯的差異。士大夫刊印醫書最基本的原因是對醫學知識有興趣。學界已經指出宋代士人好尚醫學成風。²⁴ 近年唐代醫療史研究則指出唐代不少士人也對學習、撰寫、和傳播醫療知識有興趣，顯示士人尚醫和傳播醫方的舉動有其唐代淵源。²⁵ 除了士人尚醫之風外，學界多以印刷術發達、政府重視醫學、宋代社會視醫學為仁政來解釋士大夫付梓醫書之舉。²⁶ 關於印刷術發達的解釋，雖然南宋士大夫刻書風氣蓬勃，但近期研究已指出士大夫並未刊刻所有他們有興趣的文類。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卜算書籍的刊行。據目前研究看來，縱然當時朝廷曾刊印風水書

²¹ 田建平主張南宋路級機構的書籍雕板集中在兩浙、江東西、福建、湖北路，出版機構為轉運使司、茶鹽司等實權機構，並提出此現象呼應了這些路的經濟發達，反映這些機構有雕板書籍的充裕財力。田建平，《宋代出版史》，頁 288。

²² 其他四例見表二總號 91, 102, 119, 129。

²³ 表二總號 64, 67, 69, 75, 81, 90, 100-101, 106-107, 144, 184。

²⁴ 韓明士 (Robert Hymes) 的先驅研究指出元代婺州士人因入仕途徑受阻，遂多人轉而行醫。陳元朋則證明了宋時士人已有尚醫之風，亦有士人以醫為業者，不待元代才出現此現象。Robert Hymes, "Not Quite Gentlemen? Doctors in Sung and Yuan," *Chinese Science* 8 (1987): 9-76; 陳元朋，《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

²⁵ 范家偉，《大醫精誠——唐代國家、信仰與醫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7），頁 147-168；范家偉，《中古時期的醫者與病者》（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頁 153-185, 200-222；陳昊，《身分敘事與知識表述之間的醫者之意——6-8 世紀中國的書籍秩序、為醫之體與醫學身分的浮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 167-168, 177-193。

²⁶ 例如：章健，〈宋代官刊方書和個人方書特點探討〉，《中華醫史雜誌》31.2 (2001)：75-77；韓毅，《宋代醫學方書的形成與傳播應用研究》，頁 558-563, 658-661, 737-740；許媛婷，〈南宋時期的出版市場與流通空間——從科舉用書及醫藥方書的出版談起〉，《故宮學術季刊》28.3 (2011)：122-129。

《地理新書》、士大夫有研讀和編寫卜算之書的興趣、與卜算術士多有交流、並為此類術士撰文，但卻少見士大夫刊刻卜算之書。²⁷ 此例顯示我們必須更細緻地分析士大夫參與醫書雕板的原因，無法僅以印刷技術發展和士大夫喜刻書泛泛而論。

本文將士大夫刊刻地方醫書的理由再分為訴諸的理念與現實動機兩個層次。三十九位士大夫出版者，共留下二十九篇序或跋介紹所刊刻的醫書。²⁸ 在這二十九篇中，最普遍訴諸的刊刻理念為濟眾惠民。對於地方官員，刊刻醫書以惠民是仁政的表現。廣傳醫書以惠民的仁政觀念可追溯至唐代。唐玄宗於開元十一年(723)「親製《廣濟方》，頒示天下」，但未明言具體的頒示方式。²⁹ 天寶五年(746)，玄宗慮「單貧之家，未能繕寫。閭閻之內，或有不知。倘醫療失時，因至夭橫。性命之際，寧忘惻隱。宜命郡縣長官，就《廣濟方》中逐要者，於大板上件錄，當村坊要路榜示。仍委採訪使勾當，無令脫錯」。³⁰ 這種以廣傳醫書來展現統治者仁心的做法和類似詞彙也可見於宋代朝廷和地方官員的醫書刊印上。

在訴諸廣傳醫書以濟眾的理念時，士大夫具體提到的欲濟之眾可以再細分為偏遠地區之眾、為俗醫所誤之眾、因是書罕傳而不知該書之眾等。其中因某地之眾不知該書故雕板醫書的理由特別值得注意，這理由顯示了即使在印刷術發達的南宋，醫書的分佈仍有地域落差。葉夢得(1077-1148)「嘗病東南醫尤不通仲景術」。仲景即東漢《傷寒雜病論》的作者張機。張機的《傷寒論》在北宋曾至少三度刊行，其中二次由國子監刊刻(表二，總號 15, 26)，國子監於元祐三年(1088)將《傷寒論》作小字刊刻前，兩浙路已出現出版者不明的小字本(表二，總號 25)。即使如此，據葉夢得所言，十二世紀的福建醫者仍不通傷寒醫療。葉夢得遂將宋朝士大夫王實《傷寒治要》「乃為鏤板，與眾共之」(表二，總號 63)。淳熙十二年(1185)，延璽於福建任官時感慨洪遵所刻的《洪氏集驗方》、胡元質出版的《胡元質總效方》(又名《胡氏經驗方》)，以及楊倓刊的《楊氏家藏方》三書流行於江

²⁷ 對宋代士人寫給術士的讚美性文本的討論見廖咸惠，〈體驗「小道」——宋代士人生活中的術士與術數〉，《新史學》20.4(2009)：1-58。宋代政府雖曾禁止民間私藏「天象器物、讖候禁書」，卜算書籍的抄本與刊本仍傳播不絕，只是少見士大夫參與其中，見劉祥光，《宋代日常生活中的卜算與鬼怪》(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頁22-27, 149-190。

²⁸ 表二總號 37, 40, 50, 52, 60-61, 63, 68, 71, 79-80, 84, 91-93, 95-97, 102-103, 108, 119-120, 123, 127, 129, 133, 138, 175。

²⁹ 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八二，〈醫術〉，頁1524。

³⁰ 唐玄宗，〈榜示廣濟方敕〉，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史部第45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卷一一四，頁724。

淮士大夫和醫家間，且用之多效，但可惜閩地距離江淮或當塗遙遠，猶未有此三書，遂刻三書於福建路提點刑獄司（表二，總號 97-99）。嘉泰四年（1204），知婺州的李景和言自己使用《葉氏錄驗方》中的療法，多有奇效；而「江淮間人多信用之。它所或未之見，予故刻之東陽郡齋」（表二，總號 119）。上述三個案例共通反映了南宋江淮富庶區流行的醫書有時罕見於他處，特別是福建。醫書刊刻的地域差異也提醒學界在討論南宋醫書的流通和醫學知識的發展時，可能要更加注意地域差別，不能以印刷術蓬勃發展，醫書流傳甚廣一語帶過。

至於濟眾說辭下的現實動機，由於士大夫刻書的相關史料常只留下序跋，不比朝廷刻書可從詔令和奏疏、地方政府刻書可從政府機構的性質來論證刊印的現實動機。但由極少數的例子可知（如後文分析真州知州刊刻《普濟本事方》〔以下簡稱《本事方》〕的案例），士大夫刊刻地方醫書自有其現實動機，非仁政和國家影響可以完全解釋。此觀察也呼應學界近年指出仁政無法完全解釋北宋朝廷刊刻醫書的政策。例如：北宋校正醫書局的設立是為了有良好的醫書參考，以照護邊境駐軍和居民的健康、有助國防。³¹ 此外，朝廷所刻醫書有時是用作官方醫學教育的教科書，例如北宋初朝廷編纂和刊刻《太平聖惠方》。³² 有時是希望所傳播的醫療知識能成為該領域的共通遵循知識，例如《銅人腧穴鍼灸圖經》。夏竦於天聖四年（1026）該圖經的序中記其「名曰《新鑄銅人腧穴鍼灸圖經》。肇頒四方，景式萬代」，清楚表達朝廷希望此書與銅人可以作為鍼灸的標準知識。³³ 這種作為醫學教科書和標準化醫療知識的努力，都較少見於士大夫刊刻地方醫書的敘述中。此外，當刊刻醫書的機構是公使庫時，雕板醫書很可能還有印書或出租雕板以營利的意圖。³⁴ 這些各

³¹ 范家偉，《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頁 15-22。

³² 韓毅，《宋代醫學方書的形成與傳播應用研究》，頁 115-120。

³³ 王惟一撰，黃龍祥、黃幼民校注，《銅人腧穴鍼灸圖經》（收入黃龍祥主編，《針灸名著集成》，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頁 168。宋代史料對《銅人腧穴鍼灸圖經》編者姓名的記載有出入。成文時間最接近該書成書時間者，是夏竦之序，序記「王惟一」；《郡齋讀書志》（約成於紹興二十一年[1151]）則作「王惟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卷一五，頁 722。

³⁴ 宋代公使庫曾刊刻的醫書諸如：前述紹興十七年（1147）時福建路轉運司公使庫校正、重刊《太平聖惠方》（表二，總號 67），以及南宋時池州公使庫刊刻校正本的《南陽活人書》（表二，總號 90）。宋代公使庫所刻書的概括表見田建平，《宋代出版史》，頁 315-316。

異的現實動機反映了不同的出版者出於不同動機參與了醫書刊刻，而其所刻的醫書集合起來，形成宋代醫書刊印蓬勃的現象。³⁵

校勘是宋代醫書出版前的重要工作。仁宗時由館閣儒臣校正醫書，校正方法包括比較不同傳本、兼查經史百家相關資料、補缺遺文、刪除重複、重定編次、去除書中怪誕不經之說等。徽宗時未延續儒臣校書的政策，改由醫官曹孝忠校對醫者唐慎微的《經史證類備急本草》（以下簡稱《證類本草》），並在一個月內就完成校對。³⁶ 類似於朝廷校勘醫書，有些士大夫出版者也提到雕板前的校勘工作，但很少提及校勘過程，校勘者則是文臣、醫官、醫者皆有。例如：朱肱在政和八年（1118）重新刊刻自著的《南陽活人書》（又名《傷寒百問》）前，「遂取繕本，重為參詳，改一百餘處」（表二，總號 52）。淳熙十一年（1184）朱端章於南康郡齋付梓《衛生家寶產科備要》前，曾由翰林醫學差充南康軍駐泊張永校勘該書。³⁷ 張孝忠在淳熙十二年（1185）雕板南宋進士許叔微的《本事方》前，與「老於醫，砭艾尤工」的「蜀人劉奇」，討論方中所記病證（表二，總號 96）。葉大廉於淳熙十三年（1186）龍舒郡齋雕板《葉氏錄驗方》前，「俾壽春劉良弼、三山許堯臣二醫士詳加校正」（表二，總號 102）。嘉定四年（1211）左右知潼川府劉甲「命僚屬重加參訂（《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如麥誤為來、槐誤為魏、射干為射十、驚癩為馬癩之類，非一點畫，偏旁所誤雖微，而用藥之差遠甚。悉釐而正之，弗可枚舉」，將改正字體視為最主要的校正工作。該書的校勘者為前監戶部紹興府諸暨桑溪酒庫劉忠信、特差充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舒璘和樓鎮、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帳司□□湘（姓名脫漏）、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張調。³⁸ 雖然有士大夫參與地方醫書校勘的記錄，但這些記錄大多只留下官銜和名字，難以深入分析他們校勘醫書的方法和特色。

與上述刊刻理由和校勘者的參與相比，士大夫出版者刊印的醫書類別較明顯與朝廷不同。朝廷所刻醫書可分為宋代朝廷編纂者（十八份，約佔三十九份朝廷醫書

³⁵ 近期的明清出版史研究也逐漸不將印本的興盛視為印刷術進步的必然結果，而是強調書籍傳播者出於不同動機，刻意選擇手抄或印刷的方式傳播，相關討論見 Suyoung Son, *Writing for Print: 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pp. 1-124.

³⁶ 仁宗與徽宗朝的醫書校正工作見范家偉，《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頁 95-163, 260-265。

³⁷ 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第 1 冊，頁 30。

³⁸ 唐慎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 30 冊，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2），頁 7-8。

刊刻版本的百分之四十六）、³⁹ 宋以前的醫書（十六份，約佔三十九份的百分之四十一）二大類。⁴⁰ 與之相比，士大夫出版者更常付梓宋代私人編纂的醫書（共四十二份，佔五十份士大夫醫書刊刻版本的百分之八十四）。⁴¹ 這現象也呼應費袞《梁谿漫志》（成書於紹熙三年[1192]）的觀察：「近時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驗方》，流布甚廣，皆仁人之用心。」⁴² 費袞沒有說明誰在流傳士大夫編寫的《家藏方》和《集驗方》、以及用什麼方式流傳（例如：手抄、雕板、刻石等），但其語佐證了當時士大夫私纂的醫書流傳甚廣一事。

在刻書種類上，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所刊印的醫書中，不少為傷寒醫書（共十二份，八位出版者）。其中三位出版者即為作者本人（朱肱、許叔微、王實，表二總號 52, 61-62）。二位是為了教化偏遠地區的居民，如：慶元元年（1195），朱熹（1130-1200）門人、知福州的詹體仁（1143-1206）刊刻南宋郭雍（1091-1187）的《傷寒補亡論》；朱熹將詹體仁此舉相連至過往蔡襄（1012-1067）守福州時「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等教化民眾信巫不信醫的政策（表二，總號 108）。明代張昞的《吳中人物志》記嘉泰年間（1201-1204），知武岡軍的王可大憫於「俗多信禳祥而不喜醫藥，往往殞於非命」，刻許叔微《傷寒百證歌》、成無己《傷寒明理論》和《藥方說》（疑為成無己《傷寒方論》）（表二，總號 116-118）。這種傳播傷寒醫書以教化信巫不信醫之眾的政策，可追溯到熙寧六年（1073）左右知虔州的劉彝。劉彝因虔州「其民多疫，民俗不知，因信巫祈鬼。乃集醫作《正俗方》，專論傷寒之疾。盡籍管下巫師，得三千七百餘人，勒之，各授方一本，以醫為業」。⁴³

³⁹ 表二總號 1-4, 11-14, 22, 27, 35-36, 39, 41, 49, 55, 70, 73。

⁴⁰ 表二總號 6, 8-10, 15-17, 19-21, 26, 28, 31-34。

⁴¹ 表二總號 24, 29-30, 37, 40, 52-53, 59-63, 68, 71, 79-80, 82, 84, 91-99, 102-103, 108, 110-112, 116, 119, 123, 127, 132-133, 138, 149, 175。

⁴² 費袞，《梁谿漫志》（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 5 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第 2 冊），卷八，頁 221。

⁴³ 曾敏行，《獨醒雜誌》（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 4 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第 5 冊），卷三，頁 143。劉彝知虔州至熙寧六年（1073），見李燾撰，上海師大古籍所、華東師大古籍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二五一，頁 6108。兩宋官員或以抄本、或以雕板，傳播傷寒醫書以教化信巫不信醫民眾的政策，顯示了寫本和印本間的連續性。這現象也呼應近年中國印刷史學界的討論轉向。過往著重探討宋代以降印刷術的進步、寫本和印本間的差別。近年研究反思上述取徑過度突出了寫本文化與印本文化間的斷裂，並轉而注意兩者間的延續、以及寫本和印

上述士大夫刊印的傷寒醫書類別也顯示過往學界可能高估了監本《傷寒論》的直接影響，而忽略其他詮釋文本的存在。例如郭志松 (Asaf Goldschmidt) 主張在北宋校正醫書局校正、再由國子監刊刻《傷寒論》前，該書在漢、宋之間罕有流傳，傷寒醫療也不發達。監本《傷寒論》的出現使醫者接觸到過往罕見的《傷寒論》，從而讓這些醫者面臨到如何將漢代《傷寒論》中的醫療理論應用於宋代醫療實踐的問題；這些醫者在所著的傷寒醫書中頻繁討論此問題，造成宋代傷寒醫書大增。⁴⁴然而兩宋朝廷以外的出版者很少直接刊印《傷寒論》，而是出版詮釋《傷寒論》的醫書，如刊刻郭雍、許叔微、朱肱的傷寒著作。

士大夫在說明為何選擇刊刻某書時，最普遍的理由是該書記載的醫理或療法有效驗。這理由在本文後半分析的士大夫撰寫之醫書序跋中頻繁出現，為了避免重複分析和引用史料之贅，此處不另做申論。在所刻醫書有效驗的普遍理由下，地緣和人際關係也是影響士大夫刻書選擇的重要因素。地緣因素可表現在雕板紀念前任知州所編纂的醫書。例如紹興二十年 (1150) 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樓璣刻劉昉纂集的《幼幼新書》，是因劉昉病逝於知潭州的任上。樓璣權知潭州後，「僕問諸府人，公治潭久，凡所興立，不為苟且，計得無有，肇端既闕，偶未就者」，屬僚以《幼幼新書》來告，樓璣遂刻該書紀念劉昉（表二，總號 68）。

本並存的現象等。例如：艾朗諾 (Ronald Egan) 指出寫本在宋代仍為重要的知識傳播方法。Ronald Egan, "To Count Grains of Sand on the Ocean Floor," in Chia and De Weerd,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pp. 31-62.

⁴⁴ 郭志松並以此傷寒醫療的發展為例，主張宋代為中國醫療發展的三個轉換時期之一。三個時期依序為：醫學「經典理論」(canonical theory) 形成的漢代、經典與實作融合的宋代、十九世紀以降的西醫衝擊。《傷寒論》在治平二年 (1065) 監本出現前流通不廣之說早可見於文樹德 (Paul Unschuld) 和葉發正的作品。郭志松的創見在於提出新的歷史框架，來解釋宋代傷寒醫書大增的風潮，並反思宋代對中國醫療發展的重要性。之後席文 (Nathan Sivin) 沿襲郭志松的論點，也認為《傷寒論》在北宋政府刊刻前流傳不廣。郭志松提出此論點後，學界也有修正其論點者，例如：遼銘昕提出治平二年以前部分宋代傷寒醫書的作者參考的是《太平聖惠方》中有關傷寒的部分。范家偉認為監本醫書在北宋流通率有限。本文主張即使在南宋，監本《傷寒論》的流通可能仍不若學界預想的廣泛。Nathan Sivin, *Health Care in Eleventh-Century China*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5), pp. 56, 63; Paul Unschuld,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Ide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p. 168-169; 葉發正, 《傷寒學術史》(上海: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5), 頁 5; 范家偉, 《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 頁 189-205; 遼銘昕, 《宋代傷寒學術與文獻考論》(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16), 頁 251-253。

另一種影響刻書選擇的地緣因素是刊刻該州的知名人士所著之醫書。乾道六年(1170)知真州的張郊如此說明刻書理由：

儀真許叔微，字知可，少孤力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於醫，建炎初，劇賊張□破真州，已而疾瘕大作，知可遍歷□□，視病與，十活七八。一夕夢若神人者謂曰：「汝平生有遺恨乎？」知可曰：「遺恨有三。少失怙恃，不得至菽水之養，一也。束髮讀書，望一第為門戶計，今年逾五十而無所成，二也。後嗣未立，為不孝之大，三也。」神曰：「汝亦有陰功耶？」知可則以建炎疾疫之事告之。神曰：「上帝政以此命汝以官，錫汝以子，父母則不可見。」因留語之：「藥市收功，陳樓間阻，殿上呼盧，喝六作五。」知可既覺，不知□謂。後登紹興二年第，名在第六，以恩例升第五人，⁴⁵實在陳阻言、樓材之間，為徽、杭教官，改京秩，仍得子，夢中之言，無一不契。其自序言杳冥之中，似有所警，正謂是也。郊嘗假守儀真，知其事為詳，因此書刻板，置江夏郡齋，非但廣知可救物之心，且著天道福善之報云。

(表二，總號 80)

許叔微籍貫真州，在紹興二年(1132)以五十三歲高齡進士登第。殿上臚傳唱名時，因屬推恩人，從第六名升為第五名，之後曾任翰林學士。登第前他一面應舉一面行醫，任官後付梓自著的《傷寒百證歌》，並於晚年完成《本事方》。許叔微任官表現不詳，但他的登科故事在南宋廣泛流傳，也因此成為宋代最著名的醫書作者之一。引文所述的登科故事只是其中一個版本，其他版本散見於南宋各家筆記，如：方勺(1066-?)《泊宅編》、⁴⁶曾敏行(1118-1175)《獨醒雜志》、⁴⁷吳曾《能改齋漫錄》(成於1154-1157年間，1190年重刊於成都)、⁴⁸洪邁(1123-1202)《夷堅甲志》(約1160年成書)、⁴⁹陳錄《善誘文》(1221年序，最晚在1273年收入

⁴⁵ 引文原文作「弟」，當皆為「第」字誤。

⁴⁶ 方勺記許叔微科舉屢試不第，寄居於浙右村落中，合藥施人。日久，夢人贈四句詩，後登第如詩所言。方勺，《泊宅編》(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2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第8冊)，卷九，頁211。

⁴⁷ 《獨醒雜志》版本的許叔微行醫原因與《本事方》自序相同，而且字句類似，或曾參考過《本事方》自序。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七，頁172。

⁴⁸ 《能改齋漫錄》是故事情節與其他筆記出入最大者，其中行醫者和做夢者都變成許叔微之父。吳曾，《能改齋漫錄》(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筆記·第5編》第4冊)，卷一八，頁237。

⁴⁹ 《夷堅甲志》的版本變成許叔微屢試不第，一日，夢人告知若欲登科，「須積陰德」。許叔微自度家中素貧，能力許可的積陰德方式唯有行醫，遂開始習醫治病。歲月日久，救活

左圭的《百川學海》中刊行)。⁵⁰ 在這些版本中，許叔微的行醫原因、作夢者、所夢之人、或四句詩的字句常有出入。共通處為治病救人、夢中提示、四句詩的基本內容和殿試結果「呼盧喝六」這四個情節，故事核心主旨皆為行醫積德而登科。張郊刻《本事方》不只出於許叔微醫術高超，也因許叔微為真州人，還為了彰顯天道福報，似有藉此教化州民的意味。⁵¹ 約二十年後，知真州的左昌時記許叔微的陰德陽報故事「郡人皆能言之」，反映許叔微仍是該州知名的士大夫。左昌時在紹熙二年(1191)序中，敘述他得到張郊侄子張孝忠的「手校善本」後，「因鏤板以惠邦人」。左昌時在該序又記「其陰德陽報見於寺丞張公所書之夢」，應是其刻版時保留了張郊序(表二，總號 103)。

為何兩任真州知州先後雕板《本事方》，而不刊刻許叔微的《傷寒百證歌》與《傷寒發微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張郊和左昌時沒有收藏這兩部傷寒專著。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本事方》為綜合性方書，理論上比專論傷寒的方書更能涵括真州軍民可能遭逢的疾病。真州所屬的淮南東路在紹興十一年(1141)紹興和議後成為宋金邊境，戰爭頻仍。據前引張郊序，許叔微在建炎年間戰亂後流行「疾疫」時，活人甚眾。此事間接證明了他的醫術可治療戰亂後爆發的疾疫。序中提及的張姓「劇賊」應是建炎二年(1128)焚真州、江寧府等地的張遇。⁵² 乾道元年(1165)隆興和議後，朝廷更加積極地經營兩淮險要之處的山水寨為防禦據點。⁵³ 據左昌時

之人不可勝計。復夢當年人贈他一詩，之後登科事如詩預言。《醫說》、《太上感應篇》也收錄相似版本的故事。洪邁，《夷堅甲志》(收入氏著，何卓點校，《夷堅志》第1冊)，卷五，頁38；張杲，《醫說》(收入紀昀等總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74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一〇，頁223；李昌齡傳，鄭清之贊，《太上感應篇》(收入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20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卷三，頁684。

⁵⁰ 《善誘文》的版本加重神明指引的角色，並將此故事帶入濃厚的佛教色彩：許叔微敬事白衣觀音，向觀音求登科。夜夢觀音曰：「汝前生無恩德及人，如欲登第，能以藥餌濟惠世人，必獲福報。」許聽其言行醫救人。將兩年時，復夢觀音贈以內含「呼盧喝六」的四句偈。陳錄，《善誘文》(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7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16，第2冊)，頁60。

⁵¹ 這種地方官員刊刻其地鄉賢作品的例子還可見於文集雕板，見朱迎平，《宋代刻書產業與文學》，頁151-152。

⁵² 張遇活動事蹟簡述見黃寬重，《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頁88。

⁵³ 黃寬重，〈兩淮山水寨：南宋中央對地方武力的利用與控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2.4(2001)：801-831。

言：「初刊此書，會郡之將領趙善蕙者素患頭風，自言用方中附子、川芎，一藥立愈」（表二，總號 103），證明真州軍人有使用此書刊本。學界已指出校正醫書局的設立源於韓琦於嘉祐二年（1057）建議朝廷校正和傳播醫書，以守護邊地軍民健康。韓琦所建議校正的藥方書《廣濟方》、《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也都是綜合性的方書。⁵⁴張郊和左昌時刊刻《本事方》很可能也有類似目的。

人際關係比地緣關係更明顯地影響了士大夫所刻書的選擇。五十份士大夫刊刻的醫書版本中，十六份的出版者即為作者或編者本人。⁵⁵另有五份是出版者與作者間有人際連結，諸如同僚、親戚、朋友和師徒，包括：元豐（1078-1085）年間，河東路經略使兼知太原府的呂惠卿從屬下孫宰得到孫家的《（孫氏）傳家秘寶方》（又作《孫尚秘寶方》），在元豐八年（1085）「序而刻之」。該書是孫宰之父「尚藥奉御太醫令」孫用和所撰（表二，總號 24）。宣教郎解縣丞寇約在宣和元年（1119），鏤版印造其叔寇宗奭的《本草衍義》（表二，總號 53）。乾道九年（1173）曾協刻《本事方》前，已聽過許叔微治愈其伯父的事蹟（表二，總號 84）。張孝忠在淳熙十二年（1185）《本事方》跋中，言刊刻該書是「以成叔父之志」，跋文復記他的叔父曾與許叔微弟子范應德「與之游」；張孝忠幼時「嘗從（范應德）授書」，應曾向范應德學習過醫術。張孝忠可說是以許叔微再傳弟子的身分，刊刻許叔微的著作（表二，總號 96）。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鄒應龍刻伍起予《外科新書》時，在開禧三年（1207）的序中言「起予平昔屢用屢效」，似與伍起予頗為熟稔（表二，總號 123）。學者已指出北宋校正醫書局最初的組成班底，有張圍繞著知醫儒臣高若訥、隱而不顯的人際網。⁵⁶與之相比，士大夫在刊刻地方醫書時，更不諱言人際關係如何左右自己的刻書選擇。

總結而言，士大夫刊刻地方醫書時，與朝廷刻醫書在付梓理由和校勘者的參與形式上頗有相似之處，兩者都標舉濟眾惠民的說詞。兩者的差異處為：朝廷多雕板宋代朝廷編纂和宋以前的醫書，士大夫出版者則更偏好刊行宋代私人編纂的醫書，且地緣與人際關係也更明顯影響了士大夫選擇刊刻的醫書。囿於許多宋刊醫書的出版者不詳，我們無法確定士大夫是否為南宋最主要的出版群體，只能說他們在其中佔有一席之地。然而，以下兩節從刊印協助者的角色切入，將顯示至遲自十一世紀晚期，士大夫即是地方醫書刊印活動中的重要群體。

⁵⁴ 范家偉，《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頁 15-22。

⁵⁵ 表二總號 29, 37, 52, 61-62, 71, 79, 82, 91-92, 94-95, 102, 110-111, 132。

⁵⁶ 范家偉，《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頁 67-81。

三·士大夫主動以交遊網絡推行醫書付梓

本節與下節所論之士大夫協助醫書刊刻的方式，較少見於朝廷刻醫書的活動中，是地方醫書刊刻的特色。本節以黃庭堅推行龐安時《傷寒方論》付梓的書信為主，分析士大夫在宦游四方時，如何分送醫書和推動醫書的刊刻。此批書信是少數留下較多訊息，可供學者分析宋代士大夫如何以交遊網絡推動醫書付梓的史料。

龐安時 (1042-1099) 為蘄州蘄水人，自幼隨以醫為業的父親龐慶習醫，活動範圍在蘄州蘄水一帶。十五歲後病聾，「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貫通」，撰成多部醫書。⁵⁷ 所撰諸書中，龐安時特別努力推廣傷寒醫書。十一和十二世紀的史料對龐安時撰寫的傷寒醫書各有不同的稱呼，在討論《傷寒方論》的刊刻前，必須先釐清到底這些稱呼是否指同一部書。⁵⁸ 張耒 (1054-1114) 在龐安時的墓誌銘中，引用龐對所撰醫書的回顧：「予欲以其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解》數萬言……著《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傷寒之變，補仲景《傷寒論》……作《本草補遺》一卷。吁，其備矣。」⁵⁹ 回顧全篇墓誌銘僅提到龐安時撰寫過一部有關傷寒的醫書，但沒有指明書名。現存龐安時自己提到所撰之傷寒醫書書名的史料，只有一條，出現在他回覆蘇軾的信：「安時所撰《傷寒解》，實用心三十餘年。廣尋諸家，反覆參合，決其可行者始敢編次。」⁶⁰ 考量到龐安時五十八歲便過世，這部寫了三十多年的書應是他晚年才完

⁵⁷ 張耒撰，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五九，〈龐安常墓誌銘〉，頁 872-873。龐安時為今湖北蘄水縣人的考證，見毛德華，〈龐安時生卒年和里籍辨誤〉，《湖北中醫雜誌》1990.4：34。

⁵⁸ 如遼銘昕所證，現存龐安時的傷寒醫書雖通稱為《傷寒總病論》，但此名稱並非定於龐安時，而是政和三年 (1113) 所刊刻的龐安時傷寒醫書（表二，總號 42）。遼銘昕並指出在政和三年前，蘇軾有關龐安時的傷寒醫書的史料，稱該書為《傷寒論》、《傷寒方論》和《傷寒解》。遼銘昕，《宋代傷寒學術與文獻考論》，頁 118-119。中國學界對蘇軾和龐安時的書信往來多有討論，但皆直接將兩人往來書信中提到的「《傷寒論》」視為龐安時現存的《傷寒總病論》。本文認為由於《傷寒論》在宋代通常是指張機所撰者，需經一番考辨，才能說明蘇軾信中的《傷寒論》為龐安時著。例如：李官火，〈蘇軾與龐安時〉，《浙江中醫雜誌》38.9 (2003)：406-407；張衛、張瑞賢，〈文豪蘇東坡奇遇名醫龐安時〉，《中醫藥文化》1.1 (2006)：20-21。

⁵⁹ 張耒，《張耒集》卷五九，〈龐安常墓誌銘〉，頁 874。

⁶⁰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收入《朱肱、龐安時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6），〈上蘇子瞻端明辨《傷寒論》書〉，頁 201。

成。雖然龐安時稱該書為《傷寒解》，但在蘇軾和張耒可能指稱該書的文章中，都只提到《傷寒論》，而未言及《傷寒解》。

《傷寒論》在宋代通常是指東漢張機的《傷寒雜病論》（又名《傷寒卒病論》）。蘇軾留下與《傷寒論》有關的兩篇文章的文義都比較曖昧，不確定文中所提的《傷寒論》是張機所寫者還是龐安時所撰者。例如蘇軾言龐安時「刪錄張仲景已後《傷寒論》，極精審，其療傷寒，蓋萬全者也」。⁶¹張耒的〈跋龐安常《傷寒論》〉一文，從文名和內文合觀之，則明確可見他所言的《傷寒論》乃龐安時撰者：「惟仲景《傷寒論》，論病處方，纖悉必具……龐安常又竊憂其有病證而無方者，續著為論數卷。」⁶²張耒可能視龐安時的傷寒醫書為張機《傷寒論》的續著，所以仍稱該書為《傷寒論》。黃庭堅在其他文章中亦曾提到龐安時的《傷寒論》。考量到龐安時生前只撰寫過一部傷寒醫書，黃庭堅欲推行付梓的《傷寒方論》應即為龐安時的《傷寒解》、蘇軾和張耒所言的龐安時《傷寒論》。本文以下統一以《傷寒方論》稱龐安時的傷寒作品。

龐安時推廣《傷寒方論》的方法是將該書贈送給蘇軾和黃庭堅。從現存史料看不出他贈送的《傷寒方論》是印本，也不見他曾推動該書付梓。例如：蘇軾在元祐元年（1086）答龐安時的信中，言「惠示《傷寒論》，真得古聖賢救人之意，豈獨為傳世不朽之資……謹當為作題首一篇寄去」。⁶³因為沒有龐安時的來信留下，我們無法確定蘇軾為《傷寒方論》作題首是否出於龐安時的請求。十一世紀時欲推動龐安時著作雕板的主導者為蘇軾和黃庭堅。兩人皆為官員，亦是文壇領袖。蘇軾在元祐元年另回信龐安時：「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便當為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⁶⁴不知此雕板計畫最後是否落實。蘇軾欲雕板龐安時著作的史料只存此信，但信中內容簡短，無法顯示官員或文壇領袖的身分，如何幫助該書付梓。

黃庭堅留下較多與龐安時作品刊刻有關的文章，其大多於貶至戎州後撰寫。黃庭堅在元符元年六月（1098年7月）抵達貶謫地戎州，元符三年十二月（1101年1月）離開戎州，赴峽州。他在抵達戎州後，仍欲透過中介者袁質夫與龐安時聯絡，

⁶¹ 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七〇，〈書龐安時見遺廷珪墨〉，頁2223。

⁶² 張耒，《張耒集》卷五三，〈跋龐安常《傷寒論》〉，頁809-810。

⁶³ 蘇軾，《蘇軾文集》卷五三，〈答龐安常三首〉，頁1586。信成時間參自蘇軾著，李之亮箋注，《蘇軾文集編年箋注（詩詞附）》（成都：巴蜀書社，2011），第7冊，頁118。

⁶⁴ 蘇軾，《蘇軾文集》卷五三，〈答龐安常三首〉，頁1586。

曾言：「聞龐安常頓欲以金絲笛兩管見寄，而知命不好事，不為攜來。質夫歸，可為取之。……亦致意安常，老來極思相與從容……《八十一難》多有古人不到處，及揅擊俗子臆說，甚為愜當。當為作一序送成都刻大字板，並奉寄也。」⁶⁵此文無題，當是寄給友人袁質夫的信。袁質夫生平不詳，只能從黃庭堅的其他書信，知為市井中人（見後文討論）。從信中黃庭堅欲將《八十一難》送到成都雕板判斷，應為黃庭堅在戎州時所寫的信。《八十一難》傳為扁鵲所作，黃庭堅重視此書或許是受到龐安時影響。龐安時不但讀過該書，對扁鵲也極為推崇，嘗言「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⁶⁶

黃庭堅一開始是希望將《傷寒方論》「掇其大要，論其精微」，但遇到「心腹之疾」，未成此事。⁶⁷元符二年(1099)春，黃庭堅去信成都友人、蜀僧範長老：

近編寫得蕪州龐老《傷寒方論》一部，極臻致，欲付成都開板。試與問士人家，有能發心開大字一本，即作序並送矣。⁶⁸

信中「編寫」一詞應指曾將《傷寒方論》編輯和悉心抄寫過。雖然黃庭堅曾編輯此書，但在他其後的相關書信和此書後序中，都稱該書為「龐老《傷寒（方）論》」，不以編者或作者自居。黃庭堅希望將《傷寒方論》送到成都以大字雕板刊刻。戎州地處偏遠，成都雖然距離戎州約兩百七十五公里，已是當時最近的雕板中心。黃庭堅請範長老詢問是否有願意承接此事的「士人家」。信中並未說明「士人家」是指官戶、或家族中曾有文官出仕者、或泛稱對印刷書籍有興趣的家族或家庭。只說若有人願意承接，他將為此書作序，並將序送給刊刻者。黃庭堅時為文壇領袖，並以書法聞名。當時甚至有遠從一千七百公里外的惠州（今廣東惠州市）至戎州，求黃庭堅親書一贊者。⁶⁹考量到黃庭堅的文壇領袖身分及其書法價值，他的序不止可以幫助推廣《傷寒方論》，序文本身即是墨寶。

⁶⁵ 黃庭堅撰，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雜論〉，頁2328。

⁶⁶ 張耒，《張耒集》卷五九，〈龐安常墓誌銘〉，頁873。龐安時讀過扁鵲《八十一難》之事見黃庭堅，《黃庭堅全集》，〈龐安常《傷寒論》後序〉，頁415。

⁶⁷ 黃庭堅，《黃庭堅全集》，〈龐安常《傷寒論》後序〉，頁415。

⁶⁸ 黃庭堅，《黃庭堅全集》，〈又〉，頁2052。

⁶⁹ 此事見黃庭堅，《黃庭堅全集》，〈書簡公畫像贊後〉，頁1407。另一個故事是黃庭堅在戎州時以「寫書一卷」的代價，換得袁藥院珍視的家藏書一軸。黃庭堅，《黃庭堅全集》，〈書丹青引後〉，頁1566。

在致書範長老後約半年、即元符二年十月十日（1099年11月24日），黃庭堅在寫給雲夫七弟的信中，又提及欲將《傷寒方論》刻板事：

龐老《傷寒論》無日不在几案間，亦時時擇默識者傳本與之。此奇書也，頗校正其差誤矣，但未下筆作序。序成，先送成都開大字板也。⁷⁰

龐安時早在元符二年二月初六（1099年2月28日）逝世。⁷¹推測他的逝世地點仍在生前的主要活動範圍。黃庭堅此封信和之後在戎州推動刊刻《傷寒方論》的相關書信，都看不出他知曉龐安時逝世一事。或許與四川、湖北兩地距離遙遠，訊息傳遞較慢有關。信中「頗校正其差誤矣」可能指《傷寒方論》校正了張機《傷寒論》的錯誤，也可能指黃庭堅校正了《傷寒方論》的錯誤。考量到現存史料不見黃庭堅精於醫術，前者的可能性較高。信中的「默識者」可能是能理解或欣賞龐安時醫術者，也可能是自學醫術者。⁷²

元符二年年底或三年年初（皆1100年初），黃庭堅再次去信範長老：

龐老《傷寒論》，前袁道人一見，欣然欲了此緣。遂便與作序，並以新抄數本付之矣，不知師舜更用就成都開否？若欲開印，報示元監院，歸時並寫序一本去。⁷³

元監院曾多次往來戎州和成都，替黃庭堅和範長老傳遞書信和物品。《傷寒方論》已由袁道人答應付梓，黃庭堅又贈送數份該書抄本給對方。信中亦顯示，他並不清楚該書是否已在成都開版雕刻。元符三年三月（1100年4月12日到5月10日間），黃庭堅為《傷寒方論》寫後序。⁷⁴之後直到他在一年後離開戎州時，期間再

⁷⁰ 黃庭堅，《黃庭堅全集》，〈報雲夫七弟書〉，頁2122。

⁷¹ 張耒，《張耒集》，〈龐安常墓誌銘〉，頁875。

⁷² 梁其姿指出刻本醫書的增多讓自學習醫成為宋金元醫學知識傳播的新途徑。Leung, "Medical Learni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pp. 391-392. 吳以義指出金元書籍取代親炙成為醫學知識傳播的主要途徑後，門人的分布地明顯擴散。吳以義，〈溪河溯源：醫學知識在劉完素、朱震亨門人之間的傳遞〉，《新史學》3.4 (1992)：57-94。

⁷³ 黃庭堅，《黃庭堅全集》，〈又〉，頁2053。

⁷⁴ 黃庭堅，《黃庭堅全集》，〈龐安常《傷寒論》後序〉，頁414-415。本節所引的三封書信都是根據此後序來反推寫信時間。第一封信〈與範長老一二〉言「書中託尋一僧伽帽，今則已暖，不用矣」，可知最早應成於春暖之時。第二封信〈報雲夫七弟書〉結尾記「十月十日兄庭堅報雲夫七弟」，但不知年分。第三封信〈與範長老一二〉言「承剎中亦事事未足，而來者皆云，年歲間必成辦，果能爾否？」，推知在歲末年初左右。從三封信都提到成都開板事，可知成於黃庭堅元符元年六月（1098年7月）抵戎州後。而三信應都在元符三年（1100）三月黃庭堅完成《傷寒解》後序前所作，故可知成於元符二年（1099）春到三年三月間。

無他推動《傷寒方論》於成都大字刊刻的信留下。在上述推廣《傷寒方論》書信中出現的範長老、元監院、師舜、袁道人等人，都罕見於其他宋代史料，只能從黃庭堅留下的書信知道他們活動在成都一帶。此贊助案例除了應是出版者的袁道人外，還可見多種刊印協助者，諸如：黃庭堅透過人際網絡尋找出版者並贊助序文、範長老居中尋找出版者、元監院於兩地間傳遞書信和待刻的文本。

黃庭堅自言他推廣《傷寒方論》付梓的努力，另激發了友人袁質夫欲於長沙刊刻該書的計畫：

慈湖袁質夫雖隱於市井中，然敦厚誠實，常有濟物活人之心。聞余欲刻龐安常方論板紙，欣然請之。將至長沙，俾善工大字深刻。……涪翁題。⁷⁵

此文年分不詳，文末署名的「涪翁」是黃庭堅晚年的自號。文中的袁質夫欲分送醫書的對象和黃庭堅頗有不同。袁質夫打算在長沙刻書後，「施數百本；使人知疾本，家得良醫」，施書對象沒有特別限定。前述黃庭堅在戎州分送《傷寒方論》的方法則是「擇默識者傳本與之」。雖然不知黃庭堅如何判斷誰為「默識者」，但明顯對施書對象是有選擇性的。而且他所送的抄本數量再多也不會多至數百本，遠不及袁質夫打算刊刻百本之數。除了此文外，並沒有其他史料提到袁質夫最終是否將該書雕板。現存《傷寒方論》最早的確定雕刻記錄是出版者和出版地皆不詳的政和三年本，所刻書名為《傷寒總病論》。該版本有三卷，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還附《音訓》一卷、《修治藥法》一卷（表二，總號 42）。此版本在宋刊本中是屬於中字偏小字本，並非黃庭堅和袁質夫欲雕的大字本。⁷⁶

黃庭堅積極推動《傷寒方論》刊刻的活動中，有一事令人不解：為何他不自行刊刻該書？從現存黃庭堅在戎州時所寫書信看來，最直接的推想是，黃庭堅無法負擔大字深刻《傷寒方論》的費用。黃庭堅在戎州所寫的詩偶爾提及生活節約，但無法確定這是純粹的日常實況陳述，還是雜糅了描繪貶謫生活的文學筆法。不過，他曾致信範長老：「石刻文納上，並以銀五兩、紗五疋，聊助買石僦工。」⁷⁷ 此封信無法看出所欲刻石的文章為何，但可證明黃庭堅在戎州時，有能力並且願意出資銀五兩和紗五疋協助石刻文章。而銀五兩是否足以支付大字深刻《傷寒方論》的費

⁷⁵ 黃庭堅，《黃庭堅全集》，〈雜論〉，頁 2328。

⁷⁶ 張秀民主張宋刊本以中字本為多，見張秀民，《中國印刷史》，頁 161。

⁷⁷ 黃庭堅，《黃庭堅全集》，〈又〉，頁 2056。

用？學者曾估算十一世紀晚期銀一兩約等於一千到一千二百文銅錢。⁷⁸ 銀五兩則約等於五千到六千文錢。而北宋刻工工價史料稀缺，學者曾推算南宋末年刻工工價，按字計算約一字一文銅錢。⁷⁹ 假設《傷寒方論》內容與現存的《傷寒總病論》相同，則《傷寒方論》內文總長度約五萬多字，光雕板費用就約五萬文銅錢，還不計算印刷成書時所需的紙張、裱褙、棕墨等開銷。⁸⁰ 如此看來，獨立支付大字深刻《傷寒方論》的費用可能對黃庭堅並非小錢。

雖然黃庭堅可能難以負擔大字深刻《傷寒方論》的全部費用，但亦不見他出資贊助《傷寒方論》出版事。這可能是因史料殘缺，也可能是黃庭堅未曾捐款贊助。然而，即使黃庭堅不曾出資贊助，也無法斷言他不在意《傷寒方論》是否真能付梓，還必須考量另一種可能：黃庭堅的行事風格是偏好以自己的書蹟作為報酬，請人代勞。此風格清楚展現在他寫給範長老的另一封信：「聞成都乃有《華嚴大疏》，但二十五千便可成就。果爾，為尋一好事者與致來，卻與寫渠所要文字也。」⁸¹ 信中看不出可「成就」的是僱人抄寫還是複印《華嚴大疏》。四川在宋時大體上是單一鐵錢區，「二十五千」應指二萬五千文鐵錢，在紹聖初期（1094-1097）約等於一萬文銅錢。⁸² 黃庭堅並未提及如何支付二萬五千文錢，只言請範長老找一位「好事者」將《華嚴大疏》的抄本或印本帶給他，他會為這位好事者寫對方想要的文字。從該信觀之，黃庭堅似是打算用自己的書蹟代替那二萬五千文鐵錢。若真如此，這做法與黃庭堅推廣《傷寒方論》的模式非常類似：透過成都範長老詢問願意承接任務者，並以書蹟回報承接者。

雖然不知龐安時的論著最終是否在杭州、長沙、成都三地付梓，但上述龐安時醫書刊刻的史料仍揭露了兩個重要現象。第一，宦游四方的官員是讓醫書不論以抄

⁷⁸ 北宋十一世紀的銀價變動參見王文成，《宋代白銀貨幣化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頁 173-182。

⁷⁹ 楊繩信，〈從《磧砂藏》刻印看宋元印刷工人的幾個問題〉，《中華文史論叢》1984.1：41-58，特別是頁 47-53。

⁸⁰ 在本文下節的討論中，另可見南宋醫書作者尋求刊刻資金的努力。刊印費用的高低受多項因素影響，例如：所刻書的卷數多寡、字體大小、刻字深淺、板木與紙張品質、印刷份數、時間與地域差別等。中國印刷史界對宋代刻書成本與印本書籍售價多有討論，但因史料零散，仍無法定論兩宋的刻書成本。對宋代刻書成本和書價的近期回顧與討論，見田建平，《宋代出版史》，頁 576-598。

⁸¹ 黃庭堅，《黃庭堅全集》，〈又〉，頁 2053。

⁸² 紹聖初期，銅錢千可易鐵錢二千五百，見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一八〇，〈食貨下二〉，頁 4385。

本或印本的形式，得以跨區域、遠距離傳播的推手之一。第二，學界已指出十二世紀以來，「士人」(scholar) 和醫者的網絡和私人刻書在宋代醫書刊刻的角色逐漸加重。⁸³ 龐安時醫書刊刻相關史料則顯示此網絡在十一世紀晚期時就已經對個別醫書的雕板發揮重要作用。

除了黃庭堅外，朱熹也曾利用人際網絡推動醫書雕板。可惜現存關於此事的史料細節遠不及黃庭堅推動龐安時醫書付梓事豐富，只知朱熹約於慶元元年 (1195) 詢問其門人、知福州的詹體仁是否有意刊刻南宋郭雍的《傷寒補亡論》，之後詹體仁同意刊刻該書（表二，總號 108）。⁸⁴

四·士大夫應邀借書、出資、贈文

相對於主動推行醫書付梓，有一些宋代士大夫是受到欲刊刻醫書者的請托，才涉入刊刻活動。本節依序討論士大夫應邀借書、出資、和贈文的行為。這三者的區分只是概略而言，因為有時同一位士大夫會應邀借書又贈文。從本節所分析的案例可見被求的士大夫不一定精研醫術，也不一定熟悉向他尋求贊助的人。在此情況下，求者通常是無功名、但通文墨的廣義士人。而求者看重的應是被求者作為士大夫的聲名；換言之，是被求者較高的社會資本或文化資本。士大夫應邀介入地方醫書刊刻活動的現象遂反映了在廣義的士人群體內，官員、有功名者、無功名者間的層級差異。

士大夫提供書籍以供雕板的例子可見李光在瓊州（今海南島）推行刊刻初虞世《古今錄驗養生必用方》（以下簡稱《必用方》）的事件上。李光於紹興十五至二十年 (1145-1150) 間在瓊州。一日與瓊州知州討論「近世方術之妙」時，認為妙者無出於《必用方》者。瓊州知州便欲刊行該書，李光便將所藏的《必用方》授予知州。宋代這種將所讀醫書互相推薦或流傳的舉動不只見於士大夫。只是士大夫不但留下較多的此類史料，更是頻繁且定期跨區旅行的一大群體。⁸⁵ 李光將此事記入

⁸³ Leung, "Medical Learni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p. 395.

⁸⁴ 朱熹一生刻書四十餘種，甚至曾刻書營利，但不曾自行刊刻醫書。《傷寒補亡論》也是朱熹門人少數所刻的醫書。方彥壽有多篇論著探討朱熹及其門人的刻書事蹟，後收錄於氏著，《朱熹學派與閩台書院刻書的傳承和發展》（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⁸⁵ 宋代士大夫的旅行特色見 Ellen Cong Zhang, *Transformative Journeys: Travel and Culture in So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0).

〈跋再刊初虞世《必用方》〉。⁸⁶ 跋文名稱顯示李光知道該書曾經雕板。⁸⁷ 或許其所藏本即為刊本。

有時出版者會向同一對象求書又求文。劉宰在嘉定元年 (1208) 追述：「醫生」呂啓宗曾提到醫書中「論證明白，用藥精審」者，無出許叔微的《本事方》，可惜該書雖流行於江淮和浙江一帶，但刊本皆「火於兵」。⁸⁸ 兵火可能指開禧北伐 (1206-1207) 時，金軍對兩淮造成的破壞。「醫生」在南宋可指醫者、太醫局或地方醫學中的醫學生。⁸⁹ 呂啓宗擔心《本事方》就此湮沒，並將此事告知「句曲施君某」。施君聞知後，有意將該書刻板，但苦無善本。施君想起劉宰曾在真州任官，便請呂啓宗代為詢問劉宰是否藏有《本事方》。施君對真州本有興趣，可能是因許叔微為真州人，也可能因十二世紀晚期知真州的張邲、左昌時各曾付梓過《本事方》。劉宰得知此事後，即授予呂啓宗真州舊本，並讚美施君此舉濟人之處「愈於刊釋老經文萬萬也」。這句讚美暗示將刊印醫書以活人的功績，放在刊刻宗教經文的積德脈絡理解。劉宰在慶元二年 (1196) 曾任真州司法，距左昌時所雕板不過五

⁸⁶ 李光，《莊簡集》（收入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28 冊），卷一七，〈跋再刊初虞世《必用方》〉，頁 618。跋文末尾記「紹興癸亥 (1143) 二月初吉，上虞李某題」。然而根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等史料，李光紹興十三年 (1143) 於藤州（廣西藤縣），至紹興十五年 (1145) 才到瓊州。李光貶瓊州時間見方星移，《宋四家詞人年譜》（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8），頁 170-185。其他南宋官員在宦游地推動醫書刊刻的例子，如：張孝忠在紹熙元年 (1190) 到開禧元年 (1205) 間宦游臨安、襄陽等地時，搜得金人成無己所撰的《注解傷寒論》十卷、《明理論》三卷、《論方》一卷；後在郴山刊行三書（表二，總號 120-122）。郴山在南宋郴州境內，見王象之撰，李勇先校點，《輿地紀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第 4 冊，卷五七，頁 2158-2159。

⁸⁷ 《必用方》在宋代至少曾二度雕板。最先由該書作者初虞世在元豐年間 (1078-1085) 刊刻（表二，總號 23）。初虞世所刊的《必用方》於紹聖五年（即元符元年，1098）由宗室趙捐之重校刊行（表二，總號 38）。宋代提及初虞世的史料見於筆記。筆記中，初虞世是公卿爭相邀請的「名士善醫」。每逢「貴人」求治病，初虞世往往索取重金，至對方於「不可堪」、難以負荷之境。但初虞世如此做並不表示他貪財，因為他旋將所得施於貧者。唯一的例外是黃庭堅。初虞世每得佳墨奇玩，必送給黃庭堅。若這故事屬實，初虞世便擁有充足的財力、名譽、人脈來促成他雕板《必用方》。他的名氣也解釋了為何在十多年後，趙捐之會將該書重校出版。初虞世的故事見十一世紀朱彧，《萍洲可談》（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筆記·第 2 編》第 6 冊），卷三，頁 175-176。

⁸⁸ 劉宰，《漫塘集》（收入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70 冊），卷一九，〈《本事方》序〉，頁 529-530。

⁸⁹ 龔純，〈南宋的醫學教育〉，《中華醫史雜誌》11.3 (1981)：137-138。

年。⁹⁰ 施君聽聞劉宰的讚美後，又透過呂啓宗向劉宰求再刊《本事方》之序。⁹¹ 這事件不但顯示部分官員會在仕宦地搜集醫書，也反映了士人、「醫生」、士大夫之間，以醫書付梓為名建立起人際聯結。⁹²

劉宰應施君所求，為之成序文一篇，序中劉宰對施君的勉勵反映了醫書刊刻可積德的概念。這概念顯示宋代醫書雕板不只與仁政、儒 / 士濟眾的理念有關，另可能有積德此宗教動機涉入，值得進一步討論。序中劉宰提及許叔微科舉多年不第，「及其以是方濟人，即有藥市收功」，夢呼盧喝六，最後如夢中預言登第。緊接此故事，劉宰言：「今君以壯年遊上庠，科第直摘頷底鬚爾，猶蹭蹬迄今，庸詎知造化者非有待而然乎？夫身用是方，所及有限，厥應猶爾，况板行之，使人皆得用是方者乎。勉之，吾將賀子鼎甲之捷，不止臚傳第五也。」許叔微在《傷寒百證歌》（表二，總號 61）的自序中，提到的刊刻原因為濟眾和不敢私藏有效的醫書，而非積德以助登科。而且許叔微「呼盧喝六」故事中的重點是行醫積德，但劉宰在此處延伸到施君刻書積德的福報上。劉宰序的結尾云「知可名叔微，其出處詳於舊序，茲不復贅」，所謂提到許叔微出處的舊序可能是前引的張郊序，若是，則劉宰所藏本可能是張郊或左昌時的刊本。⁹³

士大夫應邀出資贊助的案例可見於聞人規《聞人氏（小兒）痘疹論》紹定五年（1232）的自序（表二，總號 139）。序中聞人規自稱「待補國學進士」，應是指待補太學生。若是，聞人規便尚未通過太學補試，身分只比落第士子稍勝一籌。⁹⁴ 聞人規希望將該書付梓，但「力未克遂」，「邇來幸甚，獲登繡使煥章吳公門牆。一日迨暇，因有請言。公即慨然捐金以成其事」。⁹⁵ 「一日迨暇」之詞反映兩人認識已有一段時日，但不知聞人規是否曾為吳公一家診療過。兩人的交誼可能是吳公願

⁹⁰ 劉宰生平考證見劉子健，〈劉宰和脈鐵〉，氏著，《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 307-359。

⁹¹ 劉宰，《漫塘集》卷一九，〈《本事方》序〉，頁 530。

⁹² 其他南宋官員在仕宦地點得到醫書的例子，如：王晉官於歷陽時，自友人于山甫處得到《產育保慶集》（表二，總號 60）。本文第二節提到樓濤在權知潭州時，自前任知州的屬僚處得到《幼幼新書》（表二，總號 68）。趙綸在澧州任上，讀吏員所獻圖經，「見文籍之目，有灸經焉」，之後曾「冥加搜訪」（表二，總號 138）。

⁹³ 劉宰，《漫塘集》卷一九，〈《本事方》序〉，頁 530。

⁹⁴ 南宋太學補試的制度變化和待補太學生的來源，參見張維玲，〈南宋的待補與待補太學生〉，《中華文史論叢》108 (2012): 89-121。

⁹⁵ 聞人規，《聞人氏痘疹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01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聞人氏自序〉，頁 242。

意慷慨解囊的原因。聞人規未記所請之言之內容，從「公即慨然捐金」的敘述觀之，應是請對方贊助雕板費用。不過聞人規在端平二年(1235)的序對此事的追述略有不同：「書成□□□吳先生持繡節於西澗。一見遂捐金，勉之刊梓。」⁹⁶引文略去請言的部分，變成吳公立刻捐金支持。兩序所言的吳公應是吳淵。吳淵在紹定三年(1230)直煥章閣知平江府，隔年改任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⁹⁷兩序不記吳淵姓名，尊稱吳公或吳先生，且只記官職（「繡使煥章」、「持繡節於西澗」），強調了官員、特別是高層文官對該書的支持。

另一件作者向士大夫尋求刊刻資金贊助的案例，更明顯是替官員一家診療者，利用醫病關係，尋求其書雕板的機會。此案例為大理評事李迅（字嗣立）向泉江官員郭應祥尋求刊刻資金的贊助。郭應祥自述當他攜帶家中老幼至泉江任官時，還未入境就先打聽該地是否有良醫與好藥店。得到的回答是：醫者雖多但技術平庸、藥店不但僅一、二間，還缺乏稍微貴重與精細的藥材；但「邑有李嗣立廷評者」，不但廣收醫方書，且貯藏多種藥材，有問方者必告所問之方，有求藥者必給所求之藥。⁹⁸郭應祥至泉江後，一日，李迅主動登門拜訪。兩人交談後，郭應祥發現對方不但「持心近厚」、多愛人利物之言，而且問之以《難經》、《素問》、《脈訣》、《諸病源候論》諸書，皆應答如流。凡三年間，郭家人得病，李迅皆「疏方惠藥」，郭應祥不再另求他醫。某日，李迅向郭應祥出示所著《背疽方》一編，云他鑽研治療背疽多年，治人甚眾，若「君能捐二、三萬錢，刻板流布，不猶愈於刊他書乎？」郭應祥在泉江的具體官職不詳，但宋代地方官員的每月俸祿至少有六千錢，且另有其他補貼。⁹⁹單就俸祿觀之，不算其他補貼的話，則贊助二、三萬錢之於郭應祥可能並非易事。郭應祥沒有立即答應李迅。而是在當地太霄觀主持、素號通曉醫療的劉道淵用該書治愈背疽後，郭應祥才更加相信該書療法有效驗，「乃為之序其首」。郭應祥只說「樂為之成其志云」，未明言是否曾贊助二、三萬錢以促

⁹⁶ 聞人規，《聞人氏痘疹論》，〈又自序〉，頁243。

⁹⁷ 范成大撰，陸振岳點校，《吳郡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卷一一，頁155-156。

⁹⁸ 郭應祥，〈《集驗背疽方》序〉，李迅，《集驗背疽方》（收入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743冊），頁434。

⁹⁹ 地方官員俸祿見脫脫等，《宋史》卷一七一，頁4108-4109。南宋官戶的各種收入來源參見梁庚堯，〈南宋城居官戶與士人的經濟來源〉，氏著，《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1997），頁219-321。

成該書雕板。¹⁰⁰此序的撰寫時間不詳，郭應祥活躍於嘉定年間(1208-1224)，李迅的《背疽方》自序則成於慶元二年(1196)。¹⁰¹

迥異於郭應祥的序，李迅在《背疽方》自序中，隻字未提欲將該書付梓，遑論尋求雕板贊助事。不知是李迅刻意隱晦，還是序成時尚無雕板之意。李迅自序的重點在描繪自己「士」的面向和濟人之心，並與一般醫者和術士作區隔。郭應祥序中的李迅是位主動尋求刊刻贊助的醫書作者，而自序中的李迅對編纂《背疽方》是非常被動的。序中，李迅先述家世「本以儒術名家。取科第與鄉薦，代不乏人」，彰顯自己和其家的儒學素養。復自述他對醫療的興趣，只是「志在濟人而已」。接著在回顧自己如何搜集醫方時，李迅將士大夫和醫者對流傳醫方的態度作二元對比：「凡士大夫家傳名方，每喜於更相傳授。至於醫生、術士或有所長，賂以重賄，幸而得之。」¹⁰²李迅認為但凡士大夫，皆不吝流傳家傳藥方。醫者卻要先收取重金，方願意釋出藥方。相較於一般醫者，李迅指出若有人因病來求，他「隨證贈方，一無吝色」。這呼應了他所述士大夫喜相傳授醫方的舉止。引文中的對比不一定反映了實際的普遍狀況，但可顯示宋代士大夫的理想表現之一為廣傳良方。

自序接著記述李迅潛心鑽研世俗醫者視為「奇疾」而「望風斂手」的背疽之疾。一開始，他將療法試用於「田夫野人」，然後用於「富家巨室」，最後用於「貴官達宦」，皆得療效。李迅言自己屢欲將療法編集成書「以貽後人」，但「愧非專門而止」。「專門」一詞可能指醫者身分，也可能指李迅非專治背疽的醫者。直到「賢士大夫，適爾過聽，諄諄下問，欲廣其傳」，因這些賢士大夫的敦促，李迅方「用是不敢固辭」，編成《背疽方》。此語一方面突顯李迅與其他「賢士大夫」間的交遊，一方面也強調此書的編撰還受到其他士大夫的注意。在自序的結尾，李迅再度強調編纂此書「豈特愚之素志，實君子聞善相告之意也」，即此書是在其他賢士大夫、君子的敦促下才勉力完成的產物。¹⁰³李迅自序在強調自己作為士的面向，以及與賢士大夫、君子的交遊，未提到診療的酬金。郭應祥的序則顯示李迅試圖以長期診療郭家的經歷，索求刊刻費用的贊助、和地方官員為其醫術背書的贈文。

¹⁰⁰ 郭應祥，〈《集驗背疽方》序〉，李迅，《集驗背疽方》，頁434-435。

¹⁰¹ 郭應祥為嘉定間人氏，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卷二一，頁629。

¹⁰² 李迅，〈《集驗背疽方》序〉，見岡西為人，《宋以前醫籍考》（臺北：南天書局，1977），頁1139。

¹⁰³ 李迅，〈《集驗背疽方》序〉，見岡西為人，《宋以前醫籍考》，頁1139。

相較於應邀借書和出資贊助，士大夫更常應邀贈文鼓勵醫書刊刻。本節前述施君輒轉請未謀面的劉宰為所重刊的《本事方》作序一事並非罕例，在南宋還可以見到其他欲刊刻醫書者向不熟悉的士大夫求序，例如：樓鑰為王作肅《增釋南陽活人書》一書所寫的序：

吾鄉王君作肅為士而習醫，自號誠菴野人，以《活人書》為本，又博取前輩諸書凡數十家，手自編纂，蠅頭細字，參入各條之下，名曰《增釋南陽活人書》。可謂勤且博矣。自言暮齒駸駸，不欲為私藏，將版行于世，來求一言。余好醫而不能學，與之論辨，皆有據依。學者可按而求，求而得其用，始知此書之為有功也。¹⁰⁴

樓鑰只言王作肅「為士而習醫」，對於王如何為士，並沒有清楚的說明，這可能是因兩人雖然號稱是同鄉，但彼此並不相熟。兩人不熟可從兩點窺之：一是樓鑰此文對王作肅的敘述頗為簡略，不像後文分析的序文撰者會回顧與求文者的相處經過。二是樓鑰未直接答應為王作肅作序，而是先與他論辯一番、確認對方醫療知識可靠後才下筆。樓鑰自陳「好醫而不能學」，雖是自謙之語，但顯然不認為王作肅是因為重視自己的醫術造詣才來向己求文，此語也無意以自己的醫術造詣為王作肅背書。樓鑰是以文本引用的嫻熟度來檢核和稱讚《增釋南陽活人書》對讀者的助益。這選擇可能出於樓鑰自言醫術不精，又未曾見聞王作肅的醫術或使用過其書，故無法舉實例說明其書療法或醫理的效驗。樓鑰未明言與王作肅討論時，王作肅所引的「據依」為何。從引文前後的脈絡觀之，應該就是《南陽活人書》和其他數十家的前輩諸書。樓鑰之言也反映他並非毫無鑒別地答應任何人來求醫書刊行序，而是先與作者論辯、確認此書有用後，才答應為之作序。他這番說詞同時也為王作肅突顯了《增釋南陽活人書》的價值。

既然樓鑰未曾見聞過王作肅的醫術、兩人又似無舊交、樓鑰更非以醫術知名，王作肅為何還請樓鑰為其欲出版的醫書作序？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看重樓鑰的聲名，或是四明樓氏的聲望。¹⁰⁵ 此篇序的成文時間不詳。樓鑰為南宋著名朝臣，曾任溫州知州、權吏部尚書兼侍讀等職。慶元三年（1197）受黨禁之累，居鄉十三年。直

¹⁰⁴ 樓鑰撰，顧大朋點校，《樓鑰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卷五〇，〈《增釋南陽活人書》序〉，頁945。

¹⁰⁵ 樓鑰好搜藏書籍，且藝文興趣廣博，「山經地志、星緯律曆之學，皆欲得其門戶」，或許也是王作肅敢登門拜訪之因。關於樓鑰的書畫搜藏和藝文交遊，見黃寬重，〈樓鑰家族的文物搜藏與傳承〉、〈樓鑰的藝文涵養養成與書畫同好〉，氏著，《藝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人際關係》（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頁121-187。

到史彌遠任相後，才再度入朝。樓鑰是四明樓氏中官歷最高者，他努力振興樓家事業，帶起四明樓氏家族最富裕的時期。樓氏多代皆有救濟鄉里、周人之急的舉措。四明樓氏與當地望族多有姻親關係或交遊，例如與四明王氏家族為姻親。¹⁰⁶可惜無史料可證王作肅是否為王氏家族之人，只能從樓鑰為其寫的序，推測兩人並不熟悉。這種向不熟悉的士大夫求文的例子，在本節後半討論南宋醫者陳衍的出版活動中，將可見此種贊助文章的現實功用。

有時士大夫並未點明所寫之序，以及序中期許該書刊行的鼓勵，是否出於醫書作者所請求。例如：知隆慶府的曾丰在嘉泰二年（1202）為章謙《學脈指要》所作序中言：

崇仁章謙，字牧之，服儒業，舉子成矣，累試於有司不得志，轉為醫數十年，始著《學脈指要》。識者觀之，知其所自得於醫經、醫道者不淺。……余多病，俗醫見誤者不一，於醫不敢簡，故牧之至輒加禮。於醫之有所長者不敢揜，故又從而出所見，書于卷端，還以授之，俾鏤之木，以傳於焉。¹⁰⁷

跟前述樓鑰對「為士而習醫」王作肅的簡略介紹相比，曾丰對章牧之的介紹比較具體。先明言章謙是科舉不得志後，轉而為醫。復指出重視章謙是因自己多病，但俗醫多無法治療，遂在章謙來訪時多有禮遇，顯示章謙醫術頗精。不過引文最後一句看不出他為《學脈指要》作序是否出於章謙所求。

士大夫贈文的案例還見於陳衍《寶慶本草折衷》（以下簡稱《折衷》）卷首收錄的八篇同時代士大夫與士人寫的序、跋、帖、詩等。這八篇文章結合起來，營造了陳衍「儒」的形象、濟眾的志向、以及《折衷》的貢獻。此案例反映士大夫讚美文的現實功用，以及讚美文如何來自多種人際網絡，值得深入分析。學界對現存《折衷》的刻本是南宋晚期的刻本抑或元刊本尚有爭議，故本文不分析該刻本的板

¹⁰⁶ 樓鑰仕歷、四明樓氏的發展及其與當地望族的互動，見黃寬重，〈千絲萬縷——樓氏家族的婚姻圈與鄉曲義莊的推動〉，氏著，《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頁103-133。該文修改自黃寬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際網絡與社會文化活動——以樓氏家族為中心的觀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0.3（1999）：627-669。柳立言對樓氏各家庭間的互動狀態也有細緻的考察，見柳立言，〈宋代明州士人家族的形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2（2010）：289-364。

¹⁰⁷ 曾丰，《緣督集》（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第277冊），卷六二八二，〈章牧之《學脈指要》序〉（此序底本據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頁324。

陳韻如

式，僅討論贈文的內容。¹⁰⁸ 這八篇文章在該刻本中，並非依照成文時間的先後呈現。為了討論方便，表一將這些文章重新按照可能的成文時間先後，排序如下表：

表一：《寶慶本草折衷》卷首收錄之贈文¹⁰⁹

編號	時間	作者	身分	篇名
1	1231-1233	謝采伯	保康軍節度使、知徽州軍州事 ¹¹⁰	〈保康軍節度使新安太守密齋先生謝公序〉
2	1233	戴復古	詩人	〈江湖詩老戴公寓袁州賦〉
3	1242年4月	趙公	華文郎中	〈華文郎中趙公寓京邸賦〉
4	1249年8月	吳子良 ¹¹¹	成文時的官名不詳	〈荊溪吳子良序〉
5	1257年6月	鄭君	上舍正奏名；陳衍子之友	〈上舍正奏鄭君跋〉
6	1257-1259	謝奕修	知紹興府事；謝采伯之子	〈鎮越大帥倉使待制侍郎養浩先生謝公帖〉
7	約 1262	邵國璉	永嘉「省元」？ ¹¹²	〈永嘉省元邵君後序〉
8	約 1262	邵崇珍	邵國璉之兄；陳衍之婿	無題名

如表一所示，八篇贈文的時間最早可能始自紹定四年（1231），最晚至景定三年（1262）後，前後橫跨三十一年。歷時如此之久，跟陳衍撰寫本書多年不無關係。該書原名為《本草精華》，於寶慶三年（1227）初成，後改名為《本草折衷》，改名

¹⁰⁸ 鄭金生，〈《寶慶本草》校後記〉，鄭金生整理，《南宋珍稀本草三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頁 638。

¹⁰⁹ 陳衍，《寶慶本草折衷》（收入鄭金生，《南宋珍稀本草三種》），頁 422-425。

¹¹⁰ 謝采伯於紹定四至六年（1231-1233）知徽州。彭澤修，汪舜民纂，《（弘治）徽州府志》（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4，據上海古籍書店影印浙江寧波天一閣藏明弘治十五年[1502]刻本重印），卷四，頁 18a。

¹¹¹ 吳子良寶慶二年（1226）登進士第，淳祐九年（1249）所任官不詳，但淳祐六到八年（1246-1248）任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見何潔茵，〈吳子良生平、文論及散文特色〉，《廣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7.5（2014）：48-54。

¹¹² 解元、省元、進士等稱呼，在南宋時可用作對一般士人的尊稱，不一定表示對方曾取得此榮譽，所以不確定此處的「永嘉省元」是尊稱還是實指。見高橋芳郎，《宋—清身分法的研究》，頁 188；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頁 193。

時間不詳。¹¹³ 陳衍的〈《折衷》發題〉和〈後跋〉，將《本草折衷》完成的時間定於淳祐八年 (1248)。但紹定六年 (1233) 戴復古之賦 (表一，編號 2)，已提到《本草折衷》之名，可知該書至晚於紹定六年 (1233) 即以《本草折衷》之名流通。根據《折衷》所收該賦題名與內容，只知當時戴復古在袁州的宜春郡齋透過「趙史君」遇見陳衍。不過在戴復古的《石屏詩集》中，該賦題名為〈吾鄉陳萬卿，儒者能醫。見宜春趙守盛稱其醫藥之妙，著《本草折衷》，可傳〉。¹¹⁴ 查戴復古 (1167-1246?) 生年間，就任時間相符合的知袁州趙姓者，只有紹定五年 (1232) 到端平元年 (1234) 間任職的趙師恕一人。¹¹⁵ 紹定六年 (1233) 戴復古在江西旅行，拜訪了知贛州的姚鏞、知吉州的李義山、撫州軍事推官蕭學易。¹¹⁶ 應該在此年，戴復古也拜訪了知袁州的趙師恕，從而遇到陳衍。¹¹⁷

陳衍，字萬卿，名不見經傳，只能根據《折衷》的隻言片語，知其籍貫贛城，活動於十三世紀前半葉，足跡曾至臨安、永嘉、江西。八篇贈文對陳衍身分的描述有時稱儒、有時似醫。戴復古稱陳衍「儒家者流，尤長於醫學」、「儒者能醫」。¹¹⁸ 邵國璉記「贛城陳先生，飽經史而能文，尤造乎神、聖、工、巧之道」。¹¹⁹ 陳衍對自己的描述也頗為曖昧，言「愚讀書之暇，嘗從事於醫」。¹²⁰ 三人的描述皆難以判斷陳衍是醫者、還是對醫學有興趣的士人。《折衷》旁徵博引醫書以外的經史文學作品，也符合三人對陳衍儒學素養的描述。所引書諸如：《爾雅》、《茅亭客話》、《松漠紀聞》、《邵氏聞見錄》、《諸番志》、《瑣碎錄》、《酉陽雜俎》、《泊宅篇》、《避暑錄話》、《雲麓漫鈔》等。¹²¹ 但從八篇贈文皆未提到陳衍功名看來，陳衍即使通儒術，也不曾有科第功名或仕宦經歷。八篇贈文中，吳子良敘述的陳衍更接近醫者：

¹¹³ 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卷二〇，〈後跋〉，頁 636。

¹¹⁴ 戴復古，《石屏詩集》（收入氏著，吳茂雲、鄭偉榮校點，《戴復古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卷四，頁 113。

¹¹⁵ 李之亮，《宋兩江郡守易替考》（成都：巴蜀書舍，2001），頁 462-463。

¹¹⁶ 吳茂雲、何方形，《戴復古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頁 204-207。

¹¹⁷ 戴復古有一五言律詩〈宜春東湖呈趙使君〉可能便是寫給趙師恕。戴復古，《戴復古集》卷三，頁 103。

¹¹⁸ 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卷一，頁 425；戴復古，《戴復古集》卷四，頁 113。

¹¹⁹ 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卷一，頁 424。

¹²⁰ 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卷一，頁 422。

¹²¹ 陳衍引用這些作品的例子，見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卷一、二、一一、一三、一五、一七至一九，頁 446, 459-460, 492, 512, 539, 542, 583, 593, 603, 613。

陳韻如

君於醫通如許，及應人急，有酬之金幣不願也……抑君有言，鋪陳考辨，猶為紙上語也。活法在胸中，要不可以紙上盡。願其可以紙上盡者，既與俗醫相懸絕，則豈可使之終聾盲不一見哉？（表一，編號 4）¹²²

引文提到酬金，並將陳衍與俗醫相對比，似指陳衍以醫為業。但又強調陳衍不願接受酬金。吳子良未明言陳衍是否曾診治過他，而他劃分陳衍與俗醫的標準之一，是俗醫無法或不願將活人之法詳細地用文字表達。

不同於前述李迅、章謙利用醫病關係而得到士大夫的贈文，陳衍的八篇贈文幾乎未提及陳衍是否與贈文者存在醫病關係，而偏向透過拜訪、人際網絡取得贈文。陳衍在紹定四至六年（1231-1233）間將該書呈給知徽州的謝采伯。謝采伯的序文中，對該書評語的部分已經不存（表一，編號 1）。但從陳衍的回覆和感激可知謝采伯對該書的評價頗為正面。¹²³ 至晚於紹定六年（1233），陳衍將書名改為《本草折衷》，在宜春郡齋遇見戴復古和趙師恕（表一，編號 2）。約在淳祐二年（1242），他負書攜子「遠游」至臨安，於謝雨之府邸遇見華文郎中趙公（名不詳）。趙公稱讚陳衍「席上志取既當，議論且明」，遂作賦贈之（表一，編號 3）。淳祐八年（1248），陳衍作〈《折衷》發題〉。該文先歷數宋代知名的本草書籍，接著舉例說明自己的著作徵引哪些宋代醫書，又增補修訂這些醫書的何處條文。整篇文章猶如該書貢獻的摘要，令人不禁揣想此篇〈發題〉是為了方便後續拜訪士大夫而作。

至晚在淳祐八年（1248）後，陳衍極可能開始尋求鏤板該書的贊助。淳祐九年（1249）吳子良之文也是八篇贈文中首度提到期許該書付梓者：「有力者儻為錄其書行世。以之制人之偏，助人之和，其功用不少矣」（表一，編號 4）。¹²⁴ 雖然不知此期許是否應陳衍之要求而寫，但陳衍設計《折衷》時，的確將雕板設計納入考量。例如：他發現《開寶重定本草》的刻本常將白字和墨字的內文互相混淆，遂決定《折衷》只用墨字，「以防抄刻舛互之弊也」。¹²⁵

寶祐五年（1257）後的四篇贈文（表一，編號 5-8）來自多種人際網絡。首先，寶祐五年夏，上舍生鄭君（名不詳）跋《折衷》（表一，編號 5）。跋文云：「箕城陳君之子景孟從余遊……謝密齋、吳荊溪諸老題辭爛然，君不余鄙，亦俾續其

¹²² 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卷一，頁 422。

¹²³ 陳衍的回覆，見《寶慶本草折衷》卷一，頁 423。

¹²⁴ 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卷一，頁 422。

¹²⁵ 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卷一，頁 436。

後。」¹²⁶ 鄭君自謙陳衍不嫌其鄙陋，使其跋文在謝采伯和吳子良之後，可見是陳衍邀請鄭君作文支持《折衷》。陳衍能請動鄭君，應與其子和鄭君交遊有關。另外，陳衍將謝采伯和吳子良的序文一併呈示給鄭君之舉，暗示著名官員的序跋可用來邀請其他士人或士大夫題文。¹²⁷ 鄭君跋文又云「第是書夙有重賈，而積之猶謹」，似指有書商欲購買該書，但陳衍對賣書事態度謹慎。¹²⁸

寶祐五年 (1257) 到開慶元年 (1259) 間，陳衍收到來自「鎮越大帥倉使待制侍郎養浩先生謝公」的簡帖。這位謝公應是謝采伯之子謝奕修。謝奕修有養浩齋收藏書畫文物，應是帖名中「養浩先生」的由來。¹²⁹ 謝奕修在淳祐十一年 (1251) 提舉兩浙東路常平、寶祐五年到開慶元年間知紹興府，亦符合帖名「倉使」和「鎮越大帥」二詞。¹³⁰ 該帖內容簡短，多是稱讚之語。其中一句「欣□逮今《本草精華》，終日□□展讀」，尤其值得注意。《本草精華》在紹定六年 (1233) 後已改名為《本草折衷》，但該句仍以舊名稱呼，顯示此帖並非為了陳衍完成《本草折衷》而作。謝奕修讀的可能是當初陳衍送給謝采伯的《本草精華》。而此帖應該也非陳衍求文而來，否則無法解釋為何陳衍未將《折衷》送給謝奕修，而且謝奕修也不知該書已經改名。雖然不清楚謝奕修在寶祐五年到開慶元年間為何送簡帖給陳衍，但這案例顯示：作者將醫書送給士大夫後，除了得到讚美文外，該書還在其家人間流通，甚至可能引發新的讚美文章。

陳衍晚年，永嘉地區邵國璉及國璉兄、陳衍婿邵崇珍積極推動該書付梓。邵崇珍的贈文提到：《折衷》自謝采伯和吳子良「諸巨公」賞識此書後，該書「愈增聲價」，陳衍並志及板行。這句話顯示官員所寫的書籍讚美文，對提升書籍名聲可能有的現實幫助。¹³¹ 邵國璉記敘自己曾經勉勵陳衍鋟行該書，但陳衍「辭以力不能辦」。易日，邵國璉再度期勉陳衍，陳衍回答：「日自儉嗇，儲為治梓之需。遲之

¹²⁶ 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卷一，頁 424。

¹²⁷ 這種以他人所寫的序文來請求幫助的事例，在宋元贈序的使用更加明顯。關於宋元贈序的變化，見 Wenyi Chen, "When Literati Beg: Informal, Voluntary, and Collective Support in Song and Yuan Presentation Prefaces,"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8 (2019): 139-171.

¹²⁸ 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卷一，頁 424。

¹²⁹ 周密，《雲煙過眼錄》（收入楊瑞點校，《周密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第 4 冊），卷下，〈天台謝奕修養浩齋所藏〉，頁 83。

¹³⁰ 張溥纂修，《寶慶會稽續志》（收入李能成點校，《（南宋）會稽二志點校》，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2），卷二，頁 408, 423。

¹³¹ 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卷一，頁 424。

數載，工可畢矣。」¹³² 這回答證明了即便在印刷術流行的南宋晚期，還是有醫者多年儲蓄，仍難以負擔刊行二十卷自著醫書的費用。宋代提到醫資數目的史料多出現於筆記中。其記載的醫者常收入頗豐，單次診金從一萬錢到一百萬錢皆有。但這很可能並非普遍情況，否則便不會被當做奇聞軼事記在筆記中，遂也無法單據筆記記載便主張南宋行醫是收入頗高的營生。¹³³ 陳衍的回答亦顯示他應非屬於醫資以萬錢計的醫者之林。出版經費困難應該尚與《折衷》卷帙龐大有關。現存《折衷》有二十卷。前述大理評事李迅欲刊刻的《背疽方》，據同時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記，僅有一卷。¹³⁴ 即使只有一卷，李迅請郭應祥捐助的金額仍達二、三萬錢。以李迅案例推估，雕板二十卷《折衷》所費浩大。邵國璉考量到世間多疾病夭亡，若該書延遲付梓，「將如蒼生何？」於是和邵崇珍「協力經畫」，斟酌可用其儲蓄幫助陳衍「僦工鋟於椒林書舍」。邵國璉又言：「矧伯氏之子應午，傳先生學，知慕古人之風，亦勇以為請。」此句指邵崇珍之子邵應午從陳衍習醫，也欲贊助《折衷》雕板事。邵崇珍和邵國璉贊助陳衍刻書，不止有助提升陳衍的醫術聲譽，也有助於日後邵應午行醫的名聲。

邵國璉後序又云：「遂與伯氏協力經畫，酌其所儲而翼相之，僦工鋟於椒林書舍。一段奇事，甫浣期而成焉。」「浣」有「再」之意，「期」指一年。則此句應指在邵國璉和邵崇珍捐贈儲蓄相助下，《折衷》用了兩年的時光雕板於椒林書舍。邵國璉後序的落款為「景戌長至永嘉橋西邵國璉拜手謹識」。「景戌」疑為景定壬戌年的縮寫或漏字，故本文推測此序和《折衷》初刻於景定三年(1262)。除了雕板《折衷》外，邵國璉記陳衍還著有《方論英華》，言其「知音滿眼，異日必刊以垂世云」，似暗示陳衍和邵氏兄弟還有付梓《方論英華》的計畫。

陳衍的案例很難論證在多大程度上可代表宋代醫者雕板自著的狀況，進而與士大夫刊刻地方醫書的情況相比較。宋代醫者刻書留下的案例少，且與士大夫的地方醫書刊印相比，又有更明顯的個案差異。除了北宋初虞世外，南宋至少有九位醫者曾成功將醫書付梓。九人中，除了姓名不詳的明州醫家刊刻李世英的《癰疽辨疑

¹³² 邵國璉序的全文見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卷一，頁424。

¹³³ 宋代筆記中的醫資故事，見程民生，《宋代物價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頁477-481。明代留下較多也比較可信的醫資史料，見邱仲麟，〈醫資與藥錢——明代的看診文化與民眾的治病負擔〉，生命醫療史研究室主編，《中國史新論·醫療史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頁337-385。

¹³⁴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三，頁398。

論》（表二，總號 145）外，其他八人是刊刻自著。¹³⁵ 這八位醫者，除了陳衍外，幾乎未留下史料可資分析是透過哪些方式使醫書得以付梓（例如：刊印協助者為誰等）。少數有提到出版過程的史料，卻是出自批評出版者的敵對醫者，難辨虛實。例如：十三世紀中晚期在永嘉地區活動的醫者盧檀，在批評同時代、也在永嘉地區行醫的孫志寧雕板《增修易簡方論》時，提到：「志寧自恃專司命之權，脅誘公卿之重名，鋟於梓板，以華其傳；吐瀉庸盲之厲氣，播諸縉紳，以虛其譽。此其可哉？」¹³⁶ 目前雖然在宋代筆記中見到醫者索取高昂診金的故事，但醫者是否真有如此大的力量可以「脅誘公卿」，令人懷疑。盧檀的批評也顯示了即使孫志寧可能有能力付梓自著，還是希望有「公卿之重名」為他背書。

並非所有刊刻自著的醫者會在醫書前收錄士大夫的贈文。相較於陳衍和孫志寧尋求士大夫為其背書，陳衍甚至在正文前放了八篇士大夫和士人寫的讚美文，福建醫者楊士瀛採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楊士瀛曾於景定元年（1260）左右刊刻自著的《仁齋小兒方論》。該書的現存版本只收錄楊士瀛的自序，無其他士人的讚美文。自序中楊士瀛不但不諱言自己醫者的身分，還用佛教功德觀、而非純粹儒者濟眾的脈絡，來說明刻書緣由。序中，楊士瀛自問造橋「足以為福田乎」、賑饑「足以為陰德乎」；繼而言編寫小兒方書可「為天下挾提回生立命、起憊扶衰」，遂雕板該書以廣濟眾人。¹³⁷ 「福田」等用詞和這敘述順序顯示楊士瀛將自己刊刻醫書的行為，放在佛教積累陰德的脈絡下解釋。學者已指出福建路與兩浙路並列為宋代佛教最發達的兩個地區，而且福建留下最多宋代寺院或僧人造橋的史料。¹³⁸ 或許當地佛教的活躍和對造橋此公益事業的投入，刺激楊士瀛從造橋等事和福田等詞解釋編寫醫書的益處。自序結尾，他云：至於「堂上呼盧，喝六作五」之事，「小子則不敢知」。¹³⁹ 楊士瀛此語態度曖昧。他沒有明確表態是否有意藉由雕板醫書積累功德以助登科，不過該句暗示了時人會揣想無功名者刊刻醫書的原因之一是希望藉此

¹³⁵ 這八人是：宋永壽、孫志寧、張興、黎民壽、楊士瀛、陳衍、施發、嚴用和（表二，總號 115, 142-143, 151-152, 163, 170, 199-200）。

¹³⁶ 盧檀，《易簡方糾繆》（收入劉時覺，《永嘉醫派研究》，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0），卷一，頁 254。

¹³⁷ 楊士瀛，《仁齋小兒方論》（收入林憲光主編，《楊士瀛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6），〈《仁齋小兒方論》序〉，頁 351。

¹³⁸ 黃敏枝，〈宋代福建路的佛教寺院與社會經濟的關係〉，氏著，《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1989），頁 119-164，原刊於《思與言》16.4（1978）。

¹³⁹ 楊士瀛，《仁齋小兒方論》，〈《仁齋小兒方論》序〉，頁 351。

陳韻如

積德登科。在前述劉宰序和楊士瀛序中，醫書出版者施君和楊士瀛都未明言希望自己刊刻醫書之舉有助登科，而是強調濟眾與積德。施、楊的沉默暗示了對醫書出版者而言，雕板醫書有助積德登科的理由可能在當時仍羞於啟齒，不如訴諸早已被普遍接受的濟眾說詞。

五·結論

自十一世紀以降，許多士大夫刊印醫書與贊助醫書付梓。士大夫參與醫書付梓的普遍理由為濟眾惠民，也常注意醫書刊刻前的校勘工作，所請的校勘者文官和醫官皆有。以上三點都相似於朝廷刊刻醫書之舉。至於濟眾名下的現實動機，囿於缺乏序跋外可資對照的史料，只可知邊境州知州刊刻醫書可能有照護軍民健康之意，無功名者刻醫書則有時被視為欲積德以助登科等。

不同於朝廷所刻的醫書以宋代朝廷編纂者和宋以前的醫書為主，士大夫出版者們對雕板宋代私人編纂醫書更有興趣，其中又不乏宋人所撰的傷寒醫書。當這些士大夫出版者們解釋為何刊刻某部醫書時，最普遍的理由是該書的醫理和療法有驗。但若再細究史料，則可見地緣和人際關係也是重要因素。地緣關係包括：雕板紀念前任知州所編纂的醫書、雕板該州知名士大夫的醫書。人際關係如付梓同僚家屬、親戚、或醫學老師所撰的醫書。與朝廷刊刻醫書相比，士大夫刊刻地方醫書時，常不諱言自己與醫書作者的人際連結。

除了出版者外，士大夫也是重要的刊印協助者。他們會透過交遊網絡推動醫書付梓，並會應作者或出版者所求借書、捐金、贈文贊助。作者或出版者所求的對象涵括長期為其提供醫療資源的官員、不熟識的鄉里名人、筵席上和拜謁認識者。求文者所看重的並非所求士大夫的醫學知識，而是其身為士大夫（特別是官員）的聲名。與筆記等宋代出版史所討論的文史書籍相比，醫書刊刻與宗教因素有更明顯的關聯，其表現在傳播醫書可積累陰德上。

本文希望從出版文化的角度，補益學界對宋代尚醫士人的理解。學界對尚醫士人影響的探索，多從士人撰寫醫書、醫學教育政策的變化、和儒醫作為醫療群體興起等面向切入。¹⁴⁰ 本文所論士大夫作為出版者和刊印協助者的現象，有助解釋在

¹⁴⁰ 例如：Hymes, “Not Quite Gentlemen? Doctors in Sung and Yuan”；陳元朋，《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Goldschmid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pp. 42-68；祝平一，〈宋、明之際的醫史與「儒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7.3 (2006)：401-449。

宋代，當士人、醫者、甚至有才有閒有錢者皆可撰寫醫書，且缺乏撰寫和審查醫書出版的制度性門檻時，醫術普遍不高的士大夫們，為何對醫書的評價仍受到同時代醫書作者和醫術高超者所重視。前賢已指出：在以「儒家道德標準為主要社會規範」的南宋中，「儒者」對人物的評價可作為其社會地位的指標。¹⁴¹ 本文進一步揭示了士人群體內，官員、有功名者、無功名者等人間的層級差異，以及官員和有名者對醫書的正面評價對該書作者或出版者可能具有的現實幫助。

本文的討論另期待促使學界更深入地探討：校正醫書局校勘的監本醫書對宋代醫療發展的影響。本文無意否認校正醫書局所校的監本醫書對宋代醫學發展的重要性。但同時也主張這些監本醫書產生影響的途徑比學界目前所討論的更為曲折，無法只因朝廷曾雕板該書，便認為該書有影響力，或是認為後世對同部書的引用都是受該監本醫書的影響。此解釋取徑忽略了同部書還存在著其他抄本和刻本，以及對該書的詮釋文本。本文所論的傷寒醫書刊行便是明顯的例子。國子監雖然在十一世紀兩度刊刻《傷寒論》，之後作為出版者和刊印協助者的士大夫皆很少提及欲重刻《傷寒論》，而是出版宋人撰寫的傷寒醫書。黃庭堅推廣的傷寒醫書是龐安時的《傷寒方論》、朱熹推薦詹體仁雕板的是郭雍的《傷寒補亡論》。葉夢得刊刻的是王實的《傷寒治要》，王可大則雕板許叔微的《傷寒百證歌》。朱肱的《南陽活人書》，在十二世紀後於各地雕板更至少有九次之多。王作肅注釋的傷寒醫書便是《南陽活人書》，而非《傷寒論》。

本文也顯示一部醫書在雕板、流傳、產生影響這三個環節中存在著多種變項，難以只憑某書曾雕板，便假設其對宋代醫學發展有所影響。這些變項諸如：雕板散佚或遭毀損、人際網絡和尋求付梓贊助對醫書傳播的作用、醫書流傳的地域落差、原書與詮釋文本間的競合等（如《南陽活人書》在南宋似乎比監本《傷寒論》更流行）。¹⁴² 當然，本文只從書籍出版的角度出發，尚須探討刻本醫書接受的面向，此將待日後另文處理。¹⁴³

¹⁴¹ 陳元朋，〈宋代儒醫〉，生命醫療史研究室，《中國史新論·醫療史分冊》，頁 296。

¹⁴² 宋代其他書籍亦是如此，即使某部書曾經雕板，也不保證該版本在宋代能持續流傳。例如：北宋時，朝廷曾多次限制刊印文集，黨爭時又禁毀蘇軾、黃庭堅文集的雕板。宋代時文的刊刻會隨主政官員的政治立場而變化、從而淘汰不符合當前政治立場者。朱迎平，《宋代刻書產業與文學》，頁 136-141；劉祥光，〈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臺大文史哲學報》75 (2011)：35-86，特別是頁 51-52。

¹⁴³ 陳昊對《千金方》的研究便指出士人選擇所讀的《備急千金要方》時，並非一定與該書是否有官刻本相關。陳昊，〈在寫本與印本之間的方書——宋代《千金方》的書籍史〉，《中醫藥雜誌》24.S1 (2013)：69-85。

誠然，一部書的付梓或多或少都牽涉到人際網絡的動員。然而，對刊刻活動內容的關注，有助辨識刊印文類的特色，進一步突顯不同文類從抄本轉化為印本時的異同。目前深入討論宋代刊印協助者的研究較少，最近一例是魏希德 (Hilde De Weerd) 對王明清的筆記《揮塵錄》傳播分析。¹⁴⁴ 以下比較魏希德所論《揮塵錄》的刊刻和本文所論的地方醫書刊刻，以彰顯印本文化中的文類差異尚有許多討論空間。王明清將《揮塵錄》一開始的流傳歸於「故人程迥可久，知名士也，覽而大喜，手錄而識于後，繇是流傳」，而不是他主動廣傳該書。¹⁴⁵ 但即使是《揮塵錄》重要傳播者的程迥，對於撰寫《揮塵錄》的正當性也有所保留，在寫給該書的跋文中言：「雖然，僕有疑焉：仲言富於春秋，宜以壯烈上佐時用，何遽留心於著述？」¹⁴⁶ 相比之下，宋代士大夫對撰寫和出版醫書的正當性，幾乎沒有提出過質疑，這呼應了當時士人好尚醫學的風氣。影響他們是否願意贊助的因素，在於該部醫書是否有效，如樓鑰和郭應祥之例。如魏希德所言：王明清雖然沒有主動付梓《揮塵錄》，他將該書任朋友傳抄的舉動，暗示了他希望廣傳該書。不過與本文討論的南宋欲刊刻自著的醫書作者相比，王明清的舉動遠為含蓄。南宋的醫書作者，或刻意將作品呈現給不熟悉的士大夫以求讚美（如：王作肅、陳衍），或向往來的官員索取贊助經費（如：李迅、聞人規）。他們對廣傳自著和尋找刊印協助者的努力都較王明清更為明顯而積極。此差異是因書籍作者的個人行事不同，還是與文類的現實用途和廣傳論述的差異有關（例如：唐以來廣傳醫書以濟眾的正當性已建立，讓醫書作者不赧於以此理由索取刊刻贊助等），必須待學界研究其他文類的刊刻贊助後，方能更深入地探討。

（本文於民國一〇八年十月四日收稿；一〇九年八月二十日通過刊登）

¹⁴⁴ De Weerd,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pp. 312-324; Hilde De Weerd, "Continuities between Scribal and Print Publishing in Twelfth-Century Song China—the Case of Wang Mingqing's Serialized Notebooks," *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 6 (2016): 54-83.

¹⁴⁵ 王明清，《揮塵錄》（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6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第1冊），〈自跋〉，頁54。

¹⁴⁶ 王明清，《揮塵錄》，〈跋〉，頁51。

後記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〇八年度第八次學術講論會（2019年4月22日），感謝評論人陳秀芬先生及與會學者之匡正。二稿部分於「信息溝通與國家秩序」國際會議（2019年11月1日）上發表，承蒙評論人王化雨、張禕先生和與會學者惠賜重要意見。撰寫和修改期間，復蒙丁義珏、李仁淵、李貞德、祝平一、張維玲、陳元朋、陳昊、陳重方、聶文華等先生、《集刊》兩位審查人與編委會不吝賜教，並賴戴心儀和王亭方小姐協助整理文稿，在此一併致上誠摯感謝。

表二：宋代刊刻醫書概況表¹⁴⁷

總號 ¹⁴⁸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及其身分 ¹⁴⁹	刊刻時間	出處
1	開寶新詳定本草	宋·劉翰等	國子監 ¹⁵⁰	973	《宋以前醫籍考》，頁 1208-1209
2	開寶重定本草	宋·李昉等	國子監？ ¹⁵¹	974	《宋以前醫籍考》，頁 1210
3	神醫普救方	宋·賈黃中等	史館	987	《宋太宗皇帝實錄校注》，頁 515
4	太平聖惠方	宋·王懷隱等	國子監？	992	《宋以前醫籍考》，頁 715
5	劉涓子鬼遺方	南齊·劉涓子	不詳	907-1000	《宋以前醫籍考》，頁 1214 ¹⁵²
6	(南中、廣南) 四時攝生論	唐·鄭景岫	國子監？	1018	《宋以前醫籍考》，頁 722

¹⁴⁷ 本表主要依據潘銘燊博士論文的附表，並參考其他傳統典籍和當代公私藏書目錄等資料。所參考的資料除了潘文曾引用的書籍外，另包括：《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中國中醫古籍總目》、《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中國古籍總目·子部》、《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宋版古籍佚存書錄》、《宋元版刻圖釋》、《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錄》、《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海王邨古籍書目題跋叢刊》、《珍稀古籍書影叢刊之三》、《中國訪書志》、《阿部隆一遺稿集》、《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等書。本表未納入史料謹言「頒」和石刻的醫書，也不納入史料只提到欲刊刻該書、但無法確定最後是否實現者。不同的公私藏書目錄會重複記載一些宋刊醫書。在此情形下，除非行款明顯不同，否則本表不重複登記。對於學界目前尚在爭論是否為宋刊本的醫書（如《本草集方》等），也不納入表中。關於《本草集方》的刊刻年代爭議，見吳璧雍，〈《本草集方》成書與刊刻年代考〉，《故宮學術季刊》20.2 (2002)：37-61。感謝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曾紀剛博士告知該書的刊刻年代爭議。

¹⁴⁸ 總號的排序原則是將只知刊刻於宋代的醫書排在最後。其他醫書依據刊刻時間的年代下限由低至高排列。

¹⁴⁹ 判斷刊刻時的官名或身分的主要史料為：刊刻者為所刻醫書而寫的序跋。該序跋的出處見表二的出處欄。當判斷身分的史料與表二出處欄的頁碼不同時，才會另出註腳。

¹⁵⁰ 本文的討論重點在於地方醫書的刊刻，但本表仍收錄監本醫書是因本文第二節有討論監本醫書的份數，並與地方醫書作比較，而目前又尚未有兩宋監本醫書的統計成果可直接引用之故。為了與地方醫書的刊刻區別，本表將朝廷所刻醫書以加底色標示。

¹⁵¹ 由於宋代朝廷的醫書多交由國子監鑄板，當史料出處僅言詔由「有司」刊行，未明言具體機構時，本表的出版者標示為國子監加問號。

¹⁵² 出處欄《宋以前醫籍考》所引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據此版本全無宋諱字，推測其為五代宋初刻本。本文遂將刊刻時間定為九〇七到一〇〇〇年間。

總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及其身分	刊刻時間	出處
7	陳堯叟集驗方	宋·陳堯叟	國子監？	1018	《宋以前醫籍考》，頁 722
8	黃帝素問	不詳	國子監	1027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五，頁 2440
9	難經	不詳	國子監	1027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五，頁 2440 ¹⁵³
10	巢氏諸病源候論	隋·巢元方	國子監	1027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五，頁 2440
11	銅人（腧穴）鍼灸圖經	宋·王惟一	國子監？	1027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五，頁 2454
12	簡要濟眾方	宋·周應	崇文院	1051 或 1052	《隆平集》卷三，頁 116 ¹⁵⁴
13	嘉祐補註（又作注）神農本草	宋·掌禹錫等	國子監？	1061	《宋以前醫籍考》，頁 1215
14	本草圖經	宋·蘇頌	國子監？	1062	《宋以前醫籍考》，頁 1218
15	傷寒論	漢·張機	國子監	1065	《宋以前醫籍考》，頁 352
16	金匱要略方	漢·張機	國子監	1066	《明洪武鈔本金匱要略方》，頁 237
17	千金要方	唐·孫思邈	國子監	1066	《宋以前醫籍考》，頁 616
18	新雕孫真人千金方	唐·孫思邈	坊刻？	960-1068	《新雕孫真人千金方校注》，頁 565-570 ¹⁵⁵

¹⁵³ 方彥壽另記宋代麻沙有雕板《句解八十一難經》，但無附史料出處。本文未列入表中。方彥壽，《建陽刻書史》（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3），頁 97。

¹⁵⁴ 《宋史》記仁宗皇祐三年（1051）時，「頒《簡要濟眾方》，命州縣長吏按方劑以救民疾」。但沒有記載該書曾刊印。《隆平集》繫仁宗頒《簡要濟眾方》事於皇祐四年（1052），並明言「且令崇文院分作上中下三冊，印頒諸色」。故出處以《隆平集》為據。脫脫等，《宋史》卷一二，頁 231。據南宋《玉海》記載，《簡要濟眾方》為仁宗時命太醫局醫官周應等人，集《太平聖惠方》之精要者而成。王應麟撰，武秀成、趙庶洋校證，《玉海藝文校證》（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卷二九，頁 1438。

¹⁵⁵ 曾鳳考證此版本基本上不避唐諱，而宋帝避諱字直到宋英宗前（在位期間為 1064 至 1068 年）。曾鳳比較此版本與北宋國子監刊刻的《千金要方》，指出《新雕孫真人千金方》的

總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及其身分	刊刻時間	出處
19	脈經	晉·王叔和	國子監	1068	《宋以前醫籍考》，頁128
20	黃帝甲乙經	晉·皇甫謐	國子監	1069	《宋以前醫籍考》，頁219
21	外臺秘要方	唐·王燾	國子監	1069	《宋以前醫籍考》，頁668
22	太醫局方	宋·太醫局	國子監？	1078-1085	《郡齋讀書志》卷一五，頁729
23	古今錄驗養生必用方	宋·初虞世	初虞世，醫者	1078-1085	《宋以前醫籍考》，頁758
24	傳家秘寶方（又作孫尚秘寶方）	宋·孫用和	呂惠卿，知太原府、河東路經略使 ¹⁵⁶	1085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三，頁388
25	傷寒論	漢·張機	不詳	960-1088	《宋以前醫籍考》，頁352-353
26	傷寒論	漢·張機	國子監	1088	《宋以前醫籍考》，頁352-353
27	太平聖惠方	宋·王懷隱等	國子監	1088?	《宋以前醫籍考》，頁129, 352-353 ¹⁵⁷
28	千金翼方	唐·孫思邈	國子監	1066-1094	《宋以前醫籍考》，頁129, 630 ¹⁵⁸

版本異體字、俗體字、訛誤字較多，且字形前後不統一。根據這些特點，曾鳳推測此版本應為坊刻本。曾鳳，〈《新雕孫真人千金方》刊刻年代考〉、〈《新雕孫真人千金方》刻者考〉，孫思邈著，曾鳳校注，《新雕孫真人千金方校注》（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頁565-575。

¹⁵⁶ 呂惠卿在該年任河東路經略使、知太原府事，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五四，頁8469, 8478。

¹⁵⁷ 出處所引的〈宋刻脈經牒文〉只言在紹聖三年(1096)前國子監曾「開雕小字《聖惠方》等共五部出賣」，沒有指明開雕時間。不過校正醫書局〈《傷寒論》序〉言元祐三年(1088)國子監曾「准朝旨，雕印小字《傷寒論》等醫書出賣」。本文遂推測小字《聖惠方》是在元祐三年時刊刻。〈《傷寒論》序〉見岡西為人，《宋以前醫籍考》，頁352。

¹⁵⁸ 據出處欄所引的高保衡等人之〈校正《千金翼方》敘〉，校正醫書局是在治平三年(1066)上呈所校訂的《備急千金要方》後，再完成《千金翼方》的校訂。現存校正醫書局的〈校正《千金翼方》敘〉和後序都未記載刊行校正《千金翼方》的時間。根據同出處欄所引的〈宋刻《脈經》牒文〉，可知國子監在紹聖元年(1094)前曾刊行過大字版的《千金翼方》。故本文將刊刻時間定為治平三年至紹聖元年。

總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及其身分	刊刻時間	出處
29	廣南四時攝養括子	宋·何與狷	何與狷，知鬱林州	1086- 1093	《道鄉集》卷一一， 頁 256
30	經史證類備急本草	宋·唐慎微	孫升，集賢殿修撰 或集賢院學士	1091- 1094	《宋以前醫籍考》， 頁 1235-1236 ¹⁵⁹
31	黃帝鍼經	不詳	工部	1093	《宋史》卷一七，頁 335；《宋朝事實類 苑》卷三一，頁 397- 398
32	千金翼方	唐·孫思邈	國子監	1096	《宋以前醫籍考》， 頁 129
33	金匱要略方	漢·張機	國子監	1096	《宋以前醫籍考》， 頁 129
34	脈經	晉·王叔和	國子監	1096	《宋以前醫籍考》， 頁 129

¹⁵⁹ 最早記載《證類本草》刊行的史料為艾晟的〈《經史證類大觀本草》序〉。該序記「集賢孫公，得其本而善之。邦計之暇，命官校正，募工鏤版……大觀二年(1108)十月朔。通仕郎行杭州仁和縣尉管句學事艾晟序」。艾晟序中未明指孫公為誰及其刊刻時間，學界對此序的詮釋目前有四說。一說認為孫公為孫覲、刊刻時間為大觀二年。例如：尚志鈞，〈《大觀本草》的刊本〉，《本草人生——尚志鈞本草論文集》(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0)，頁 375-376；岡西為人，《宋以前醫籍考》，頁 1233。二說出自中尾萬三。他認為《證類本草》成於元豐五、六年(1082-1083)間，孫升在元祐五至八年(1090-1093)間雕板。三說見渡邊幸三。他認為《證類本草》初刊於大觀二年，集賢孫公非孫覲和孫升。四說近由周雲逸提出。她反駁一說的主要證據為孫覲在大觀三年才進士及第，不可能是艾晟大觀二年序中的「集賢孫公」。周雲逸提出：在《證類本草》約元祐五年(1090)終稿後到紹聖二年(1095)集賢院學士改稱集賢殿修撰期間，擔任集賢院學士且為孫姓者，即為孫升；而孫升於元祐五年(1090)至元祐八年(1093)擔任集賢院學士期間，刊刻《證類本草》。因孫升於元符二年(1099)過世，她主張艾晟序是為自己大觀二年刊刻的《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作序。奠基在周雲逸的考證上，配合孫升任集賢院學士的史料，本文進一步縮限刊刻時間為元祐六年(1091)至紹聖元年(1094)間。孫升於元祐六年為集賢殿修撰，元祐七年任集賢殿修撰、權知應天府，事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五七、四七四，頁 10936, 11307。紹聖元年孫升自左朝散郎充集賢院學士權知應天府，拔除集賢院學士、改知房州。宋綬、宋敏求編，司義祖校點，《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二〇七，頁 776；中尾萬三，〈紹興校定經史證類備急本草ノ考察、朝鮮ニ於ケル漢藥ノ調査〉，《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彙報》2(1933)：11-132；渡邊幸三，〈唐慎微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の系統とその版本〉，氏著，《本草書の研究》(大阪：杏雨書屋，1987)，頁 42-114；周雲逸，《《證類本草》與宋代學術文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頁 38-44。

陳韻如

總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及其身分	刊刻時間	出處
35	嘉祐補註（又作注）神農本草	宋·掌禹錫等	國子監	1096	《宋以前醫籍考》，頁129
36	本草圖經	宋·蘇頌	國子監	1096	《宋以前醫籍考》，頁129
37	經效癰疽方	宋·王蘧	王蘧，知無為軍？	1096	《宋以前醫籍考》，頁1133 ¹⁶⁰
38	重改正古今錄驗養生必用方	宋·初虞世	趙捐之，宗室	1098	《宋以前醫籍考》，頁758
39	神醫普救方	宋·賈黃中等	國子監	1099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七，頁12081
40	經史證類大觀本草	宋·唐慎微、艾晟	艾晟，杭州仁和縣尉管句學事	1108	《宋以前醫籍考》，頁1235-1236
41	校正和劑局方	宋·陳師文	國子監？	1107-1111	《郡齋讀書志》卷一五，頁729
42	傷寒總病論（附音訓、修治藥法）	宋·龐安時	不詳	1113	《宋以前醫籍考》，頁405
43	傷寒百問（又名南陽活人書）	宋·朱肱	國子監？	1111-1116	《宋以前醫籍考》，頁423；《醫方類聚》卷三二，頁136
44	南陽活人書	宋·朱肱	不詳	1111-1116	《宋以前醫籍考》，頁423
45	南陽活人書	宋·朱肱	不詳	1111-1116	《宋以前醫籍考》，頁423
46	南陽活人書	宋·朱肱	不詳	1111-1116	《宋以前醫籍考》，頁423
47	南陽活人書	宋·朱肱	不詳	1111-1116	《宋以前醫籍考》，頁423
48	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	宋·唐慎微、艾晟、曹孝忠	國子監？	1116	《宋以前醫籍考》，頁1246

¹⁶⁰ 王蘧在該書紹聖三年(1096)的自序提到自己「摸版以施」該書。《(乾隆)江南通志》記王蘧「紹聖初知無為軍」。尹繼善、趙國麟修，黃之雋、章士鳳纂，《(乾隆)江南通志》(收入鳳凰出版社編，《中國地方志集成》，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卷一一七，頁254。

總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及其身分	刊刻時間	出處
49	聖濟經	宋·曹孝忠等	國子監	1114-1118	《宋以前醫籍考》，頁 788；《宋大詔令集》卷二一九，頁 843
50	五運六氣圖（又名運氣圖）	不詳	朱肱，朝奉郎提點洞霄宮	1116-1118?	《全宋文》第 129 冊，卷二七九〇，頁 233
51	黃帝內經素問	不詳	國子監？	1118	《玉海》卷六三，收入《玉海藝文校證》卷二九，頁 1435
52	南陽活人書	宋·朱肱	朱肱，朝奉郎提點洞霄宮、大隱坊	1118	《宋以前醫籍考》，頁 423-424
53	本草衍義	宋·寇宗奭	寇約，宣教郎解縣丞	1119	《宋以前醫籍考》，頁 1221
54	史載之方	宋·史堪	不詳	1100-1125	《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子部》，頁 936
55	（政和）聖濟總錄	宋·曹孝忠等	國子監	1114-1125	《宋以前醫籍考》，頁 794；《宋大詔令集》卷二一九，頁 843
56	黃帝明堂灸經	不詳	不詳	960-1126	《宋以前醫籍考》，頁 243
57	聖散子方	宋·蘇軾	不詳	1100-1126	《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頁 212
58	編類本草單方	宋·陳造	不詳	960?-1131	《宋以前醫籍考》，頁 835
59	產育保慶集	宋·郭稽中	于山甫，刊印時官名不詳	1107-1131	《宋以前醫籍考》，頁 1087-1088 ¹⁶¹
60	產育保慶集	宋·郭稽中	王晉，刊印時官名不詳	1131	《宋以前醫籍考》，頁 1087-1088

¹⁶¹ 許媛婷，〈南宋時期的出版市場與流通空間〉中曾表列出南宋刊刻的四十八本宋代醫書，並將醫書序跋的成文年代算做刊刻年代。與之相對，本表的醫書刊刻年是以序跋明確提到者為主。以下本表的南宋醫書刊刻年與許文不同者，不另出註。

總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及其身分	刊刻時間	出處
61	傷寒百證歌	宋·許叔微	許叔微，翰林學士	1135	許叔微，〈序〉， 《傷寒百證歌》（影鈔元刊本） ¹⁶²
62	傷寒治要	宋·王實	王實，刊印時官名 不詳 ¹⁶³	1086- 1146	《宋以前醫籍考》， 頁 441
63	傷寒治要	宋·王實	葉夢得，任官或致 仕 ¹⁶⁴	1143- 1146	《宋以前醫籍考》， 頁 441
64	太平聖惠方	宋·王懷隱 等	淮南路轉運司	1146	《夷堅丙志》卷一 二，收入《夷堅志》 第 2 冊，頁 464
65	扁鵲心書	宋·竇材	竇材，刊印時官名 不詳	1146	《扁鵲心書》，頁 1
66	孫真人備急千金要 方	唐·孫思邈	不詳	1147	《日藏漢籍善本書錄 ·子部》，頁 924- 925
67	太平聖惠方	宋·王懷隱 等	福建路轉運司公使 庫	1147	《太平聖惠方》，頁 7124
68	幼幼新書	宋·劉昉	樓璘，荆湖南路轉 運判官權潭州	1150	《幼幼新書》，頁 5905-5908
69	諸家名方	不詳	只知為福建路提舉 司	1078- 1151	《直齋書錄解題》卷 一三，頁 395

¹⁶² 出處欄的〈序〉在最末記「寶祐三年歲在乙卯八月己酉翰林學士白沙許叔微知可序」。李致忠已指出許叔微是紹興二十四年(1154)過世，不可能在寶祐三年(1255)寫下此序，故序中的寶祐三年實為元人補刻。他指出歲在乙卯又符合許叔微生年的年號只有紹興五年(1135)，並據此論斷此序成於紹興五年。李致忠，〈元刊許叔微《傷寒百證歌》與《傷寒發微論》〉，《收藏家》2013.3：43。

¹⁶³ 王實於元祐元年(1086)至建炎元年(1127)間曾任藉田令、知信陽軍，見陸心源編撰，徐旭、李志國點校，《宋詩紀事補遺》（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卷二七，頁 619。

¹⁶⁴ 葉夢得僅言「余嘗病東南醫尤不通仲景術。乃為鏤板，與眾共之」。東南醫在南宋通常指閩地或嶺南一帶的醫者。葉夢得於紹興十三年(1143)任福建安撫使、紹興十四年(1144)知福州、紹興十六年(1146)致仕，推測他應是在福建任官或致仕時刊行此書。葉夢得福建任官事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一四八、一五二、一五五，頁 2380, 2458, 2499。

總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及其身分	刊刻時間	出處
70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 (附指南總論) (又名增廣校正和劑局方)	宋·太平惠民局?	國子監	1151	《玉海》卷六三, 收入《玉海藝文校證》卷二九, 頁 1440
71	備急總效方	宋·李朝正	李朝正, 知平江府	1154	《備急總效方》, 頁 1
72	校定大觀證類本草	宋·唐慎微、艾晟	國子監?	1157	《玉海》卷六三, 收入《玉海藝文校證》卷二九, 頁 1433
73	紹興校定本草	宋·王繼先等	修內司	1159	《宋以前醫籍考》, 頁 1276
74	雞峰普濟方	宋·張銳	不詳	1127?- 1162?	《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子部》, 頁 937; 《(光緒)歸安縣志》卷五二, 頁 602 ¹⁶⁵
75	外臺秘要方	唐·王燾	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	1131- 1162	《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子部》, 頁 929-932 ¹⁶⁶
76	增廣校正和劑局方	宋·吳直閣	不詳	1131- 1163	《宋以前醫籍考》, 頁 772
77	中藏經	漢·華佗?	姜詵, 提舉福建常平茶鹽等事、福建路提舉常平茶鹽司	約 1163- 1164	《宋以前醫籍考》, 頁 510
78	一切癰疽經驗方	不詳	徐綱	960-1170	《洪氏集驗方》卷二, 頁 19
79	洪氏集驗方	宋·洪遵	洪遵, 知太平州、姑孰郡齋	1170	《宋以前醫籍考》, 頁 869

¹⁶⁵ 出處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記此書為徽宗時閩中刊本, 但判斷依據是「卷中語涉宋帝皆提行。丸皆作圓。而慎字不缺筆」。然而, 丸作圓應是避宋欽宗趙桓諱(在位期間 1126 到 1127 年)。慎字不缺筆表未避宋孝宗趙慎諱(在位期間 1162 到 1189 年)。本文遂將此刊本的刊刻時間定為一一二七到一一六二年間。此定年也符合《(光緒)歸安縣志》言《雞峰普濟方》有南宋閩地刊本的記載。

¹⁶⁶ 小曾戶洋因靜嘉堂文庫所藏之宋刊本「慎」字有缺筆, 推測南宋孝宗後曾翻刻此書。小曾戶洋, 〈宋版《外臺秘要方》の書誌について〉, 小曾戶洋、篠原孝市、丸山敏秋編, 《解題・研究・索引》(大阪: 東洋医学研究会, 1981), 頁 198-202。

陳韻如

總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及其身分	刊刻時間	出處
80	普濟本事方	宋·許叔微	張郊，知真州	1170	《續修四庫全書傷寒類醫著集成》第1冊，頁602
81	傷寒要旨	宋·李穡	姑孰郡齋	1171	《中國版刻圖錄》第1冊，頁29
82	胡氏經驗方	宋·胡元質	胡元質，知太平州 ¹⁶⁷	約1173	《宋以前醫籍考》，頁884
83	普濟本事方	宋·許叔微	不詳	1173	《宋以前醫籍考》，頁846-847
84	普濟本事方	宋·許叔微	曾協，知永州	1173	《雲莊集》卷四，頁105-106
85	(叔和)脈賦	不詳	許補之	1176	《宋以前醫籍考》，頁467
86	傷寒奧論	漢·張機?	許補之	1176	《宋以前醫籍考》，頁467
87	傷寒辨疑	宋·何滋	許補之	1176	《宋以前醫籍考》，頁467
88	南陽活人書	宋·朱肱	不詳，只知為民間	1127-1178	《醫經正本書》，頁358
89	南陽活人書	宋·朱肱	不詳，只知為民間	1127-1178	《醫經正本書》，頁358
90	南陽活人書	宋·朱肱	池州公使庫	1127-1178	《醫經正本書》，頁358
91	楊氏家藏方	宋·楊倓	楊倓，知隆興府假守當塗、當塗郡齋 ¹⁶⁸	1178	《宋以前醫籍考》，頁884
92	陸氏續集驗方	宋·陸游	陸游，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¹⁶⁹	1180	《宋以前醫籍考》，頁887

¹⁶⁷ 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食貨八〉，頁6155。

¹⁶⁸ 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頁4979。

¹⁶⁹ 脫脫等，《宋史》卷三九五，頁12058。

總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及其身分	刊刻時間	出處
93	傷寒解惑論	宋·湯尹才	韓玉，刊印時官名不詳 ¹⁷⁰	1182	《宋以前醫籍考》，頁 458
94	衛生家寶產科備要	宋·朱端章	朱端章，知南康軍、南康郡齋 ¹⁷¹	1184	《宋以前醫籍考》，頁 1105-1106
95	衛生家寶	宋·朱端章、徐安國	朱端章，知南康軍、南康郡齋	1184	《宋以前醫籍考》，頁 890
96	普濟本事方	宋·許叔微	張孝忠，刊印時官名不詳 ¹⁷²	1185	《宋以前醫籍考》，頁 846-847
97	胡元質總效方	宋·胡元質	延璽，權發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 ¹⁷³	1185	《宋以前醫籍考》，頁 884
98	洪氏集驗方	宋·洪遵	延璽，權發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	1185	《宋以前醫籍考》，頁 884
99	楊氏家藏方	宋·楊倓	延璽，權發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	1185	《宋以前醫籍考》，頁 884 ¹⁷⁴
100	經史證類備急本草	宋·唐慎微、艾晟	江南西路轉運司	1185	《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 30 冊，頁 6-7
101	本草衍義	宋·寇宗奭	江南西路轉運司	1185	《中國版刻圖錄》第 1 冊，頁 30
102	葉氏錄驗方	宋·葉大廉	葉大廉，刊印時官名不詳、龍舒郡齋 ¹⁷⁵	1186	《宋以前醫籍考》，頁 892

¹⁷⁰ 韓玉在刊行《傷寒解惑論》前，曾任軍器少監兼權兵部郎官以及建康點檢牧馬，見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二〉，頁 4453。

¹⁷¹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八，頁 250。

¹⁷² 張孝忠於慶元五年(1199)時為朝請郎權知荊門軍，見周必大，《文忠集》(收入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47 冊)，卷六五，〈敷文閣待制贈少師張公邵神道碑〉，頁 687。

¹⁷³ 徐松，《宋會要輯稿》，〈兵一九〉，頁 9017。

¹⁷⁴ 現存《楊氏家藏方》還有一刻本，其中記：「阮仲猷曾刊《楊氏家藏方》於種德堂。」方彥壽，《建陽刻書史》，頁 97 定阮仲猷版為宋版。嚴紹瀾編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939-940 則定為元版。因兩說皆未附確證，本文未列入表中。

¹⁷⁵ 葉大廉刊刻《葉氏錄驗方》前，曾任太社令，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三，頁 394。

陳韻如

總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及其身分	刊刻時間	出處
103	普濟本事方	宋·許叔微	左昌時，知真州	1191	《續修四庫全書傷寒類醫著集成》第 1 冊，頁 602
104	本草單方	宋·王俛	不詳	1127-1192	《梁谿漫志》卷八，頁 221
105	三因極一病證方論	宋·陳言	不詳	1190-1194	《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頁 361-362
106	經史證類大觀本草（與本草衍義合刻）	宋·唐慎微、艾晟	江南西路轉運司	1195	《宋以前醫籍考》，頁 1236-1237
107	本草衍義（與經史證類大觀本草合刻）	宋·寇宗奭	江南西路轉運司	1195	《中國版刻圖錄》第 1 冊，頁 30
108	傷寒補亡論	宋·郭雍	詹體仁，知福州	1195	《宋以前醫籍考》，頁 462
109	是齋百一選方	宋·王璆	王璆 ¹⁷⁶	1196	《宋以前醫籍考》，頁 916
110	鍼灸資生經	宋·王執中	王執中，刊印時官名不詳	1180-1196 ¹⁷⁷	《宋以前醫籍考》，頁 269
111	莫氏方	宋·莫伯虛	莫伯虛，刑部司郎中	1101-1200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三，頁 393
112	博濟方	宋·王袞	莫伯虛，刑部司郎中	1101-1200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三，頁 393

¹⁷⁶ 王璆在宋代史料中留下的資料稀少。章楶在《是齋百一選方》的〈序〉只言「是齋王史君璆，博雅君子也，生長名家」。見岡西為人，《宋以前醫籍考》，頁 915。陳振孫僅記「山陰王璆孟玉撰《是齋百一選方》」。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三，頁 393。雖然明清有關於宋代王璆的記載，但因不確定是否為同一人，本文未用這些史料判斷王璆身分。清代相關記載如：戴瑞卿纂修，《滁陽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第 22 冊，北京：中國書店，1992，據明萬曆四十二年刊本影印），卷六，頁 60，記紹熙二年（1191）判官王璆攝令全椒縣。申嘉瑞修，李文纂，《（隆慶）儀真縣志》（收入王德毅主編，《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15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四，頁 18b，記王璆嘉泰中（1201-1204）任運判。徐松，《宋會要輯稿》，〈兵二九〉，頁 9259，紹熙三年（1192）記有「漢陽軍守臣王璆」。

¹⁷⁷ 柳濟浩，〈《針灸資生經》文獻研究〉（山東：山東中醫藥大學針灸推拿學博士論文，2014），頁 15-16。

總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及其身分	刊刻時間	出處
113	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	唐·孫思邈	不詳	1190-1200 ¹⁷⁸	《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子部》，頁 924-925
114	褚氏遺書	南齊·褚澄	劉義先	1101-1201	《宋以前醫籍考》，頁 950-951
115	產經（又名產論）	宋·宋永壽	宋永壽，醫者	1187-1203	《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二，頁 340
116	傷寒百證歌	宋·許叔微	王可大，知武岡軍	1201-1204	《吳中人物志》卷五，頁 238
117	藥方說（疑為傷寒方論）	金·成無己	王可大，知武岡軍	1201-1204	《吳中人物志》卷五，頁 238
118	傷寒明理論	金·成無己	王可大，知武岡軍	1201-1204	《吳中人物志》卷五，頁 238
119	葉氏錄驗方	宋·葉大廉	李景和，知婺州、東陽郡齋 ¹⁷⁹	1204	《宋以前醫籍考》，頁 892
120	傷寒方論（又名傷寒論方）	金·成無己	張孝忠，刊印時官名不詳	1190-1205	《傷寒明理論、方論》，收入《中華再造善本》，頁 28-29
121	傷寒明理論	金·成無己	張孝忠，刊印時官名不詳	1190-1205	《傷寒明理論、方論》，收入《中華再造善本》，頁 28-29
122	注解傷寒論	金·成無己	張孝忠，刊印時官名不詳	1190-1205	《傷寒明理論、方論》，收入《中華再造善本》，頁 28-29
123	外科新書	宋·伍起予	鄒應龍，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1207	《宋以前醫籍考》，頁 1142
124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	宋·許洪	許洪，敕授太醫助教前差充四川總領所檢查惠民局	1208	《宋以前醫籍考》，頁 775-776

¹⁷⁸ 關於學界對其現存刻本年代的討論，見陳昊，〈在寫本與印本之間的方書〉，頁 74-75。

¹⁷⁹ 李景和在嘉泰三年(1203)至開禧元年(1205)間知婺州軍州事，見王懋德撰，陸鳳儀纂修，《（萬曆）金華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76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卷一一，頁 620。

陳韻如

總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及其身分	刊刻時間	出處
125	脈經	晉·王叔和	書坊	960-1209	《宋以前醫籍考》，頁 130
126	經史證類備急本草	宋·唐慎微、艾晟	不詳	1185-1211	《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 30 冊，頁 6
127	經史證類備急本草	宋·唐慎微、艾晟	劉甲，知潼川軍	1211	《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 30 冊，頁 6-7
128	中藏經	漢·華佗？	王成父	約 1197-1213	《宋以前醫籍考》，頁 510
129	脈經	晉·王叔和	陳孔碩、廣南西路轉運司	約 1212-1214	《宋以前醫籍考》，頁 130
130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	不詳	何大任，和安大夫特差判太醫局、太醫局	1216	《宋以前醫籍考》，頁 1055
131	脈經	晉·王叔和	何大任，和安大夫特差判太醫局、太醫局	1217	《宋以前醫籍考》，頁 130
132	既效方	宋·王執中	王執中，峽州教授	1127?-1220?	《宋以前醫籍考》，頁 914
133	鍼灸資生經	宋·王執中	徐正卿，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1220	《宋以前醫籍考》，頁 269
134	歷代名醫蒙求	宋·周守忠	周守忠、尹家書籍鋪	1220	《宋以前醫籍考》，頁 1349-1350
135	診脈要捷（合脈粹、王叔和脈賦為一書）	宋·蕭處厚	王進甫	1223	《宋以前醫籍考》，頁 184
136	王叔和脈賦（附在診脈要捷後）	不詳	王進甫	1223	《宋以前醫籍考》，頁 184
137	備急灸法	宋·聞人耆年	聞人耆年	1226	《宋以前醫籍考》，頁 275
138	鍼灸資生經	宋·王執中	趙綸，通判澧州軍州事	1231	《宋以前醫籍考》，頁 269

總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及其身分	刊刻時間	出處
139	聞人氏小兒痘疹論	宋·聞人規	聞人規，待補太學生	1232	《宋以前醫籍考》，頁 1059-1060
140	重廣補註黃帝內經素問	唐·王冰	不詳	1228-1233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續目》，頁 1160
141	新編類要圖註本草（又名新編證類圖注本草、類編圖經集註衍義本草）	編者不詳	余彥國、勵賢堂	1208-1241	陳曉蘭，〈《新編類要圖注本草》及其傳刻本考察〉
142	增修易簡方論	宋·孫志寧	孫志寧，醫者	約 1241	《易簡方糾謬》，收入《永嘉醫派研究》，頁 254
143	張氏手試方	宋·張興	張興，醫者	1179-1242 ¹⁸⁰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一二，頁 13b-14a
144	集驗背疽方（又名癰疽方論）	宋·李迅	紹興官庫	1196-1245	《備急灸法》，頁 136
145	癰疽辨疑論	宋·李世英	醫者（姓名不詳）	1242-1245	《備急灸法》，頁 136
146	備急灸法	宋·聞人耆年	孫炬卿，自稱鄉貢進士	1245	《宋以前醫籍考》，頁 276
147	騎竹馬灸法	不詳	孫炬卿，自稱鄉貢進士	1245	《宋以前醫籍考》，頁 276
148	竹閣經驗備急藥方	不詳	孫炬卿，自稱鄉貢進士	1245	《宋以前醫籍考》，頁 276
149	食用本草	宋·王伯大？	鄭逢辰，刊刻前曾任金部郎中 ¹⁸¹	1200-1247 ¹⁸²	《宋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一七，頁 529-530

¹⁸⁰ 出處所引的程秘 (1164-1242) 〈《張氏手試方》序〉成文年代不詳，但程秘作序時至少應在弱冠之後，故推測成書與刊刻年在程秘弱冠後到過世間。

¹⁸¹ 鄭逢辰在端平 (1234-1236) 初任將作監簿，後任司農丞、大宗丞、金部郎官。仕宦經歷見趙汝騰，《庸齋集》（收入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81 冊），卷六，〈提刑鄭吏部墓誌銘〉，頁 296-297。淳祐六年 (1246) 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事，見方回，《桐江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22 冊），卷三，〈讀朱文公儀禮經傳跋〉，頁 404。

¹⁸² 刊刻時間年的下限推定是依據出處所引的方大琮，《宋忠惠鐵庵方公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集部宋別集類第 89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卷一七，

陳韻如

總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及其身分	刊刻時間	出處
150	普濟本事方	宋·許叔微	余唐卿宅	1253	《宋以前醫籍考》，頁 849-850
151	黎居士簡易方	宋·黎民壽	黎民壽，醫者	1260	《宋以前醫籍考》，頁 938-939
152	仁齋小兒方論（又名嬰兒指要）	宋·楊士瀛	楊士瀛，醫者	1260	《宋以前醫籍考》，頁 1071
153	產寶類要	不詳	不詳	960?- 1261	《景定建康志》卷三三，頁 1506
154	傷寒須知	不詳	不詳	960?- 1261	《景定建康志》卷三三，頁 1507
155	小兒瘡疹論方	不詳	不詳	960?- 1261	《景定建康志》卷三三，頁 1507
156	錢氏小兒方	宋·錢乙	不詳	1119- 1261	《景定建康志》卷三三，頁 1506
157	張氏小兒方	宋·張渙	不詳	1126- 1261	《景定建康志》卷三三，頁 1506
158	海上名方	宋·錢芋	不詳	1165- 1261	《景定建康志》卷三三，頁 1506
159	小兒保生方	宋·李穰	不詳	1145- 1261	《景定建康志》卷三三，頁 1506
160	傷寒明理論	金·成無己	慶友書堂	1261	《傷寒明理論、方論》，收入《中華再造善本》，頁 29
161	傷寒方論	金·成無己	慶友書堂	1261	《傷寒明理論、方論》，收入《中華再造善本》，頁 29
162	海上方	宋·錢芋	不詳	1165- 1262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三，頁 394
163	寶慶本草折衷	宋·陳衍	陳衍（醫者）等、椒林書舍	1262?	《寶慶本草折衷》，收入《南宋珍稀本草三種》，頁 424

〈鄭金部逢辰〉，頁 529-530。文中言：「嶺南去天未為甚遠，遲鈍乃爾……某五年于此，頗諳嶺俗。……又觀所刊留耕《食用本草》……」方大琮在淳祐二至七年(1242-1247)知廣州軍州事，此信當成於淳祐七年。

宋代士大夫參與地方醫書刊印新探

總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及其身分	刊刻時間	出處
164	新刊仁齋傷寒類書 活人總括	宋·楊士瀛	環溪書院	1260- 1264	程新，〈《仁齋直指方論》版本初探〉，頁 114-115
165	新刊仁齋直指小兒方論	宋·楊士瀛	環溪書院	1260- 1264	程新，〈《仁齋直指方論》版本初探〉，頁 114-115
166	新刊仁齋直指方論 醫脈真經（又名醫學真經察脈總括）	宋·楊士瀛	環溪書院	1262- 1264	程新，〈《仁齋直指方論》版本初探〉，頁 114-115
167	（新刊）仁齋直指方論	宋·楊士瀛	環溪書院	1264	程新，〈《仁齋直指方論》版本初探〉，頁 114-115
168	類編朱氏集驗醫方	宋·朱佐	不詳	1266	《中國古籍總目·子部》，頁 838
169	新大成醫方	宋·王元福	不詳	1267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本》，頁 488
170	嚴氏濟生續方	宋·嚴用和	嚴用和，醫者	1267	《宋以前醫籍考》，頁 937
171	六甲天元運氣鈐	宋·趙從古	不詳	1000- 1279	《宋以前醫籍考》，頁 1362
172	蘇沈（內翰）良方	宋·蘇軾、沈括	林靈素（託名）	1085- 1279	《蘇沈良方》，收入《中醫方劑名著集成》，頁 4
173	（董氏）小兒斑疹備急方論	宋·董汲	不詳	1093- 1279	《中國古籍總目·子部》，頁 791
174	素問入式運氣論奧	宋·劉溫舒	不詳	1099- 1279	《宋以前醫籍考》，頁 61 ¹⁸³
175	產乳備要	宋·郭稽中、李師聖	傅常，澧陽郡庠教授	1101- 1279	《宋以前醫籍考》，頁 1095

¹⁸³ 方彥壽，《建陽刻書史》，頁 97 另記宋代麻沙有雕板該書，但無附史料出處。本文遂未列入表中。

陳韻如

總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及其身分	刊刻時間	出處
176	(增校)產乳備要 (附楊子建七說並十產論)	宋·趙瑩	趙瑩	1101- 1279	《宋以前醫籍考》， 頁 1095
177	楊子建七說並十產 論(附於產乳備 要)	宋·楊子建	趙瑩	1101- 1279	《宋以前醫籍考》， 頁 1095
178	本草衍義	宋·寇宗奭	不詳	1116- 1279	《中國中醫古籍總 目》，頁 198
179	錢氏小兒藥證直訣 (附閻孝忠附方、 董氏小兒斑疹備急 方論)	宋·錢乙	不詳	1119- 1279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 本書目》甲部卷三， 頁 42
180	董氏小兒斑疹備急 方論(附在錢氏小 兒藥證直訣中)	宋·董汲	不詳	1119- 1279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 本書目》甲部卷三， 頁 42
181	金匱玉函經	漢·張機	不詳	1127- 1279	《中醫文獻學》，頁 127
182	巢氏諸病源候論	隋·巢元方	不詳	1127- 1279	《宋以前醫籍考》， 頁 578
183	本草衍義	宋·寇宗奭	不詳	1127- 1279	《宋以前醫籍考》， 頁 1221
184	嬰孩寶書	宋·湯衡	會稽郡齋	1127- 1279	《醫學源流》，頁 267
185	許學士類證普濟本 事方後集	宋·許叔 微?	余唐卿宅	1143- 1279	《類證普濟本事方後 集》，頁 259
186	醫經正本書	宋·程迥	不詳	1176- 1279	《宋以前醫籍考》， 頁 468
187	傳信適用方	宋·吳彥夔	不詳	1180- 1279	《四庫全書總目提 要》卷一〇三，頁 2106
188	新編近時十便良方	宋·郭坦	萬卷堂	1195- 1279	《中國版刻圖錄》第 1 冊，頁 45
189	方氏(類編家藏) 集要方	宋·方導	不詳	1197- 1279	《宋以前醫籍考》， 頁 919

宋代士大夫參與地方醫書刊印新探

總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及其身分	刊刻時間	出處
190	全嬰方論	宋·鄭端有	不詳	1200-1279	《宋以前醫籍考》，頁 1064
191	(廣成先生)玉函經	唐·杜光庭?	不詳	1200?-1279	《宋以前醫籍考》，頁 188
192	活人事證方	宋·劉信甫	余恭禮宅	1216-1279	《宋以前醫籍考》，頁 923
193	活人事證方後集	宋·劉信甫	不詳	1217-1279	《宋以前醫籍考》，頁 924
194	魏氏家藏方	宋·魏峴	不詳	1189-1279	《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子部》，頁 938
195	醫說	宋·張杲	不詳	1228-1279	《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子部》，頁 845
196	婦人大全良方	宋·陳自明	不詳	1237-1279	《宋以前醫籍考》，頁 1111
197	易簡方糾謬(又名續易簡方後集)	宋·盧檀	不詳	1241-1279	《永嘉醫派研究》，頁 16
198	續易簡方論	宋·施發	不詳	1243-1279	《永嘉醫派研究》，頁 16
199	察病指南	宋·施發	施發，醫者	1252-1279	《宋以前醫籍考》，頁 199
200	嚴氏濟生方	宋·嚴用和	嚴用和，醫者	1253-1279	《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子部》，頁 938
201	陳氏小兒病源方論	宋·陳文中	不詳	1254-1279	《宋以前醫籍考》，頁 1067
202	脈訣集解	宋·李駟	不詳	1266-1279	《宋以前醫籍考》，頁 203
203	劉涓子鬼遺方	南齊·劉涓子	不詳	960-1279	《中國中醫古籍總目》，頁 674
204	巢氏諸病源候論	隋·巢元方	不詳	960-1279	《宋以前醫籍考》，頁 579
205	備急千金要方	唐·孫思邈	不詳	960-1279	《宋以前醫籍考》，頁 617
206	素問六氣玄珠密語	唐·王冰	不詳	960-1279	《宋以前醫籍考》，頁 54

陳韻如

總號	書名	作者	出版者及其身分	刊刻時間	出處
207	經效產寶（又名咎殷產寶）	唐·咎殷	不詳	960-1279	《中國中醫古籍總目》，頁 563
208	芝田余居士證論選奇方（後集）	宋·余綱	不詳	960-1279	《宋以前醫籍考》，頁 928
209	黃帝內經素問遺編	宋·劉溫舒	不詳	960-1279	《宋以前醫籍考》，頁 57 ¹⁸⁴
210	本草要錄	不詳	不詳	960-1279	《宋以前醫籍考》，頁 1323
211	本草注節	不詳	不詳	960-1279	《宋以前醫籍考》，頁 1322
212	濟生產寶	不詳	不詳	960-1279	《宋以前醫籍考》，頁 1118
213	顛顛經	不詳	不詳	960-1279	《宋以前醫籍考》，頁 1016
214	脈經指南	不詳	不詳	960-1279	《宋以前醫籍考》，頁 204

¹⁸⁴ 方彥壽，《建陽刻書史》，頁 97 另記宋代麻沙有雕板該書，但無附史料出處。本文遂未列入表中。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尹繼善、趙國麟修，黃之雋、章士鳳纂，《（乾隆）江南通志》，收入鳳凰出版社編，《中國地方志集成》，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
- 方勺，《泊宅編》，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2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第8冊。
- 方大琮，《宋忠惠鐵庵方公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集部宋別集類第89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 方回，《桐江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王明清，《揮塵錄》，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6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第1冊。
- 王惟一撰，黃龍祥、黃幼民校注，《銅人腧穴鍼灸圖經》，收入黃龍祥主編，《針灸名著集成》，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
- 王象之撰，李勇先校點，《輿地紀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
- 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90。
- 王應麟撰，武秀成、趙庶洋校證，《玉海藝文校證》，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
- 王懋德撰，陸鳳儀纂修，《（萬曆）金華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7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 王懷隱，《太平聖惠方》，收入曹洪欣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第8冊。
- 永瑢等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 申嘉瑞修，李文纂，《（隆慶）儀真縣志》，收入王德毅主編，《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1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成無己，《傷寒明理論·方論》，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 朱肱，《南陽活人書》，收入《朱肱、龐安時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6。
- 朱彥，《萍洲可談》，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筆記·第2編》第6冊。
- 吳曾，《能改齋漫錄》，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5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第4冊。

陳韻如

- 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史部第 45 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
- 宋綬、宋敏求編，司義祖點校，《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
- 李光，《莊簡集》，收入紀昀等總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2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李迅，《集驗背疽方》，收入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743 冊。
- 李昌齡傳，鄭清之贊，《太上感應篇》，收入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20 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 李朝正，《備急總效方》，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2005。
- 李燾撰，上海師大古籍所、華東師大古籍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 周必大，《文忠集》，收入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47 冊。
- 周密，《雲煙過眼錄》，收入楊瑞點校，《周密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第 4 冊。
- 周應合撰，王曉波校點，《景定建康志》，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
- 金禮蒙輯，浙江省中醫研究所、湖州中醫院校，《醫方類聚》，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1。
- 施發，《察病指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998 冊。
- 洪遵，《洪氏集驗方》，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 洪邁撰，何卓點校，《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
- 范成大撰，陸振岳點校，《吳郡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 唐慎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 30 冊，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2。
- 孫思邈著，曾鳳校注，《新雕孫真人千金方校注》，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
- 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 張耒撰，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
- 張杲，《醫說》，收入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742 冊。
- 張昞輯，《吳中人物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541 冊。
- 張溥纂修，《寶慶會稽續志》，收入李能成點校，《（南宋）會稽二志點校》，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2。
- 張機，《明洪武鈔本金匱要略方》，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1。
-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 許叔微，《傷寒百證歌》，影鈔元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 許叔微，《類證普濟本事方後集》，收入曹洪欣，《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第19冊。
- 郭坦，《（備全古今）十便良方》，收入曹洪欣，《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第18冊。
- 陳衍，《寶慶本草折衷》，收入鄭金生整理，《南宋珍稀本草三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
- 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 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集部第12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 陳錄，《善誘文》，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7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16，第2冊。
- 陸心源修，丁寶書等纂，《（光緒）歸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陸心源編撰，徐旭、李志國點校，《宋詩紀事補遺》，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 彭元瑞，《欽定天祿琳琅書目》，臺北：廣文書局，1991。
- 彭澤修，汪舜民纂，《（弘治）徽州府志》，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4，據上海古籍書店影印浙江寧波天一閣藏明弘治十五年（1502）刻本重印。
- 曾丰，《緣督集》，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第277冊。
- 曾協撰，于少海點校，姚品文審訂，《雲莊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
- 曾敏行，《獨醒雜誌》，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4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第5冊。
-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 程秘，《程端明公洺水集》，明嘉靖間（1522-1566）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 程迥，《醫經正本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 費袞，《梁谿漫志》，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筆記·第5編》第2冊。
- 黃庭堅撰，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 楊士瀛，《仁齋小兒方論》，收入林憲光主編，《楊士瀛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6。
- 虞舜等主編，《續修四庫全書傷寒類醫著集成》，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

陳韻如

- 鄒浩，《道鄉集》，收入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21 冊。
- 熊宗立，《醫學源流》，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 聞人耆年，《備急灸法》，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0。
- 聞人規，《聞人氏痘疹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011 冊。
- 趙汝騰，《庸齋集》，收入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81 冊。
- 劉昉，《幼幼新書》，收入曹洪欣，《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第 13-17 冊。
- 劉宰，《漫塘集》，收入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70 冊。
- 樓鑰撰，顧大朋點校，《樓鑰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 鄭金生整理，《南宋珍稀本草三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
- 盧檀，《易簡方糾繆》，收入劉時覺，《永嘉醫派研究》，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0。
- 戴復古，《石屏詩集》，收入氏著，吳茂雲、鄭偉榮校點，《戴復古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 戴瑞卿纂修，《滌陽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第 22 冊，北京：中國書店，1992，據明萬曆四十二年刊本影印。
-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收入《朱肱、龐安時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6。
- 竇材輯，李曉露、于振宣點校，《扁鵲心書》，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0。
- 蘇軾著，李之亮箋注，《蘇軾文集編年箋注（詩詞附）》，成都：巴蜀書社，2011。
- 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二·近人論著

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編

1991 《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

2010 《中國古籍總目·子部》，上海：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編纂出版委員會編著

2013 《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方彥壽

2003 《建陽刻書史》，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2015 《朱熹學派與閩台書院刻書的傳承和發展》，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方星移

2008 《宋四家詞人年譜》，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毛德華
1990 〈龐安時生卒年和里籍辨誤〉，《湖北中醫雜誌》1990.4：34-35。
- 王文成
2001 《宋代白銀貨幣化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 王國維
2003 《五代兩宋監本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一九四〇年商務印務館《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本影印。
- 北京圖書館編
1961 《中國版刻圖錄》，北京：文物出版社，第1冊。
- 田建平
2017 《宋代出版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 吉文輝、王大妹主編
2000 《中醫古籍版本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 朱迎平
2008 《宋代刻書產業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何朝暉
2019 《晚明士人與商業出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何潔茵
2014 〈吳子良生平、文論及散文特色〉，《廣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7.5：48-54。
- 吳以義
1992 〈溪河溯源：醫學知識在劉完素、朱震亨門人之間的傳遞〉，《新史學》3.4：57-94。
- 吳茂雲、何方形
2017 《戴復古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 吳璧雍
2002 〈《本草集方》成書與刊刻年代考〉，《故宮學術季刊》20.2：37-61。
- 李之亮
2001 《宋兩江郡守易替考》，成都：巴蜀書社。
- 李弘祺
1988 〈宋代的舉人〉，國際宋史研討會秘書處編，《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史學系，頁297-314。
- 李官火
2003 〈蘇軾與龐安時〉，《浙江中醫雜誌》38.9：406-407。

陳韻如

李致忠

- 2008 《中國出版通史·4·宋遼西夏金元卷》，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
2013 〈元刊許叔微《傷寒百證歌》與《傷寒發微論》〉，《收藏家》2013.3：41-46。

周雲逸

- 2017 《《證類本草》與宋代學術文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尚志鈞

- 2010 〈《大觀本草》的刊本〉，《本草人生——尚志鈞本草論文集》，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頁 375-378。

岡西為人

- 1977 《宋以前醫籍考》，臺北：南天書局。

邱仲麟

- 2015 〈醫資與藥錢——明代的看診文化與民眾的治病負擔〉，生命醫療史研究室主編，《中國史新論·醫療史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 337-385。

柳立言

- 2010 〈宋代明州士人家族的形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2：289-364。

柳濟浩

- 2014 〈《針灸資生經》文獻研究〉，山東：山東中醫藥大學針灸推拿學博士論文。

范家偉

- 2007 《大醫精誠——唐代國家、信仰與醫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2010 《中古時期的醫者與病者》，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4 《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以國家與醫學為中心》，香港：中華書局。

凌郁之

- 2006 《洪邁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真柳誠著，郭秀梅翻譯

- 2017 〈中日韓越醫學著作數量、內容及其社會經濟背景〉，《古今論衡》30：37-76。

祝平一

- 2006 〈宋、明之際的醫史與「儒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7.3：401-449。

馬繼興

1990 《中醫文獻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輯

1957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

1967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本》，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

宿白

1999 〈北宋汴梁雕板印刷考略〉，氏著，《唐宋時期的雕板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12-71。原刊於《考古學研究（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張秀民

1989 《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張高評

2008 〈宋人詩集之刊行與詩分唐宋——兼論印刷傳媒對宋詩體派之推助〉，《東華漢學》7：67-128。

張維玲

2012 〈南宋的待補與待補太學生〉，《中華文史論叢》108：89-121。

張衛、張瑞賢

2006 〈文豪蘇東坡奇遇名醫龐安時〉，《中醫藥文化》1.1：20-21。

張燦理

1998 《中醫古籍文獻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戚福康

2007 《中國古代書坊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梁庚堯

1997 〈南宋城居官戶與士人的經濟來源〉，氏著，《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頁 219-321。

2015 《宋代科舉社會》，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章健

2001 〈宋代官刊方書和個人方書特點探討〉，《中華醫史雜誌》31.2：75-77。

許媛婷

2011 〈南宋時期的出版市場與流通空間——從科舉用書及醫藥方書的出版談起〉，《故宮學術季刊》28.3：109-146。

陳元朋

1997 《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兼論其在金元的流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陳韻如

- 2015 〈宋代儒醫〉，生命醫療史研究室，《中國史新論·醫療史分冊》，頁 245-305。

陳名婷

- 2011 〈宋代官修醫書考〉，臺中：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碩士論文。

陳昊

- 2013 〈在寫本與印本之間的方書——宋代《千金方》的書籍史〉，《中醫藥雜誌》24.S1：69-85。
- 2019 《身分敘事與知識表述之間的醫者之意——6-8 世紀中國的書籍秩序、為醫之體與醫學身分的浮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堅、馬文大

- 2000 《宋元版刻圖釋》，北京：學苑出版社。

陳曉蘭

- 2012 〈《新編類要圖注本草》及其傳刻本考察〉，《版本目錄學研究》3：231-244。

程民生

- 2008 《宋代物價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程新

- 2015 〈《仁齋直指方論》版本初探〉，《圖書館學刊》5：114-117。

遼銘昕

- 2016 《宋代傷寒學術與文獻考論》，北京：科學出版社。

黃敏枝

- 1989 〈宋代福建路的佛教寺院與社會經濟的關係〉，氏著，《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頁 119-164。原刊於《思與言》16.4 (1978)。

黃寬重

- 1988 《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2001 〈兩淮山水寨：南宋中央對地方武力的利用與控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2.4：801-831。
- 2006 〈千絲萬縷——樓氏家族的婚姻圈與鄉曲義莊的推動〉，氏著，《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頁 103-133。該文修改自氏著，〈宋代四明士族人際網絡與社會文化活動——以樓氏家族為中心的觀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0.3 (1999)：627-669。
- 2019 《藝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人際關係》，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楊玲
2012 《宋代出版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
- 楊繩信
1984 〈從《磧砂藏》刻印看宋元印刷工人的幾個問題〉，《中華文史論叢》1984.1：41-58。
- 葉發正
1995 《傷寒學術史》，上海：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廖咸惠
2009 〈體驗「小道」——宋代士人生活中的術士與術數〉，《新史學》20.4：1-58。
- 劉子健
1987 〈劉宰和賑饑〉，氏著，《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307-359。
- 劉祥光
2011 〈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臺大文史哲學報》75：35-86。
2013 《宋代日常生活中的卜算與鬼怪》，臺北：政大出版社。
- 薛清錄主編
2007 《中國中醫古籍總目》，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韓毅
2014 《政府治理與醫學發展：宋代醫事詔令研究》，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9 《宋代醫學方書的形成與傳播應用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嚴紹盪編著
2007 《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中華書局。
- 龔純
1981 〈南宋的醫學教育〉，《中華醫史雜誌》11.3：137-138。
- 小曾戶洋
1981 〈宋版《外台秘要方》の書誌について〉，小曾戶洋、篠原孝市、丸山敏秋編，《解題・研究・索引》，大阪：東洋医学研究会，頁175-267。
- 中尾萬三
1933 〈紹興校定經史證類備急本草ノ考察、朝鮮ニ於ケル漢藥ノ調査〉，《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彙報》2：11-132。
- 高橋芳郎
2001 《宋—清身分法の研究》，札幌：北海道大学図書刊行会。

陳韻如

渡邊幸三

- 1987 〈唐慎微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の系統とその版本〉，氏著，《本草書の研究》，大阪：杏雨書屋，頁 42-114。

Brokaw, Cynthia J. (包筠雅)

- 2007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hen, Wenyi

- 2019 “When Literati Beg: Informal, Voluntary, and Collective Support in Song and Yuan Presentation Prefaces.”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8: 139-171.

Chia, Lucille (賈晉珠)

- 2002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or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Darnton, Robert

- 2001 “History of Reading.” In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edited by Peter Burke. Cambridge: Polity, pp. 157-186.

De Weerd, Hilde (魏希德)

- 2015a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Written Notes’ (*biji*).” In *Imprimer autrement: Le livre non commercial dans la Chine impériale*, edited by Michela Bussotti and Jean-Pierre Drège. Geneva: Librairie Droz, pp. 19-47.
- 2015b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2016 “Continuities between Scribal and Print Publishing in Twelfth-Century Song China—the Case of Wang Mingqing’s Serialized Notebooks.” *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 6: 54-83.

Egan, Ronald (艾朗諾)

- 2001 “To Count Grains of Sand on the Ocean Floor.” In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China, 900-1400*, edited by Lucille Chia and Hilde De Weerd. Leiden: Brill, pp. 31-62.

Goldschmidt, Asaf (郭志松)

- 2009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ng Dynasty, 960-1200*.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 Hinrichs, T. J.
2011 “Governance through Medical Texts and the Role of Print.” In Chia and De Weerd, *Knowledge and Text Production in an Age of Print*, pp. 217-238.
- Hymes, Robert (韓明士)
1987 “Not Quite Gentlemen? Doctors in Sung and Yuan.” *Chinese Science* 8: 9-76.
- Leung, Angela Ki Che (梁其姿)
2003 “Medical Learni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I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Paul J.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p. 374-398, 461-467.
- Poon, Ming-sun (潘銘燊)
1979 “Books and Printing in Sung China (960-1279).”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 Sivin, Nathan (席文)
2015 *Health Care in Eleventh-Century China*.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 Son, Suyoung
2018 *Writing for Print: 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Unschuld, Paul (文樹德)
2010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Ide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Zhang, Ellen Cong
2010 *Transformative Journeys: Travel and Culture in So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陳韻如

A New Study of Scholar-officials' Roles in the Printing of Medical Texts in Song China

Ruth Yun-ju Che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Existing studies of medical publications in Song dynasty China have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medical literature printed by the court. In comparison, few scholars have examined activities through which medical texts were printed outside the court by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degree holders, physicians, private publishers, and commercial publishers. The activities in which these figures participated included deciding what to print, finding people to assist with printing projects, and collaborating in the process. Properly framing such activities is instrumental to achieving a rich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medical literature was printed in Song China.

To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abovementioned activit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scholar-officials outside the court participated in the printing of medical texts during the Song. With the phrase “scholar-officials,” I refer to educated men who either held degrees after passing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or served as officials. When discussing scholar-officials' roles in printing medical texts, existing studies have focused primarily if not exclusively on their capacity to serve as publishers. This article takes this idea a step further not only by examining scholar-officials as publishers but also by exploring their contributions as “helpers.” With the phrase “helpers,” I refer to people who facilitated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writings were printed by offering networking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aid in the printing of a given medical text.

This study will show that beginning in the late eleventh century, many Song scholar-officials became involved in the printing of medical texts outside the court as both publishers and helpers. Those scholar-officials were more interested in printing medical texts that had been completed by private individuals rather than re-printing treatises that had been edited by the Bureau of Editing Medical Texts (*Jiaozheng yishu ju*). Geo-relationship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ften affected scholar-officials' decisions regarding which texts to print. A geo-relationship might, for example, involve a

magistrate's decision to print a medical text that previous Song magistrates serving in the same administrative region had compiled as a means of commemorating his predecessors' policies. Such a magistrate might decide to print a medical text written by a famous scholar-official whose place of origin fell under the magistrate's rul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lso came into play, as some scholar-officials became involved in printing medical texts completed by their, or their colleagues', families, relatives, or medical tutors. In contrast, the Song court preferred printing medical treatises and texts that had been completed before the Song.

When serving as helpers, scholar-officials mobilized their social networks to facilitate the printing of medical texts, offering texts to be printed, funding the printing process, and endorsing printing projects in response to printers' requests. Scholar-officials who responded to such requests included officials who had received publishers' medical service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celebrities in publishers' hometowns, and others whom publishers knew through common acquaintances or social events. When publishers requested that scholar-officials write promotional pieces endorsing their projects, they generally most value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reputations of those scholar-officials rather than their healing knowledge.

The high visibility of scholar-officials as publishers and helpers in the printing of medical texts outside the Song court helps to explain why medical authors and physicians still valued scholar-officials' appraisal of medical texts during in the Song era, a period when writing and publishing medical texts were activities open to anyone. The findings I will report in this article will challenge our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Bureau of Editing Medical Tex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in the Song and exp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scholar-officials' impact on medicine through publishing culture.

Keywords: publishing culture, literati culture, medicine, printing technology, knowledge distribution